

# 导 读

《孟子》一书对中国文化史影响至深至著，尤其在独立人格的塑造、士人气节的培养上，恐无其他经典可与之相比。唐宋以来便有学者指出，“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孟氏醇乎其醇也”，“孟子有功于道，为万世师”。故作为中国人，都应该认真读读《孟子》，这在信仰缺失、物质主义盛行的今天，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孟子说，读古人之书需要“知其人”“论其世”（《尽心下》）。阅读《孟子》同样也是如此，故本导读先介绍孟子其人，再深入孟子的思想，最后说明孟子及《孟子》一书在历史上的影响。

## 一、孟子的生平事迹

孟子，名轲，战国时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著名的思想家、儒家学者。孟子生卒，西汉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东汉赵岐《孟

子章句》等均无记载。学者根据《孟子》一书的相关记载做了很多推测，大致而言，孟子生活于战国中晚期，与我国古代另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庄子处于同一时代。相对通行的说法是，孟子约生于公元前 372 年，卒于公元前 289 年，活了八十三岁<sup>①</sup>。

孟子成为著名的儒家学者，同其早年的家庭教育密切相关。刘向《列女传》记录的“孟母三迁”“杀豚不欺子”“断织劝学”等故事，反映了孟母对孟子所倾注的心血，这些都对孟子的成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孟母也被称为“母教一人”，成为中华母教的典范。

孟子生活的邹国距离孔子的故国鲁国不远，用孟子的话说，“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尽心下》）。毗邻圣人之居，孟子对孔子充满了敬仰，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在他看来，虽然自古以来出现了很多圣人，但“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并借孔子弟子之口说：“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公孙丑上》）孟子对孔子的称赞，在今天看来或许并不奇怪，但在当时却是石破天惊，振聋发聩。因为尧、舜乃天子、圣王，掌握着巨大的权力，是有德有位者，而孔子在世时只是一介布衣、一个穷困潦倒的教书先生。但是孟子不仅将孔子与尧、舜相提并论，而且认为远超越于后者之上，反映了他对孔子的推崇和敬仰。

孟子推崇、仰慕孔子，但他生活的时代距孔子已经有一百多年，他如何向孔子学习呢？孟子了解到孔子有一个孙子，名孔伋，字子思，也是一名非常了不起的儒家学者，于是他“学于子思之门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通过向子思弟子学习，了解到孔子的思想。所以孟子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离娄下》）。

孟子虽没有直接受业于子思，但他与子思的思想存在着继承关系，属于儒学内部的同一派别，史称“思孟学派”。这一学派的师承授受关系应该是：

## 孔子（仲尼）——子思（孔伋）——子思门人——孟子（孟轲）

孟子受业的子思门人具体是谁，史无记载，已不得而知。另外，子思与孔子的年龄相差较大，不可能直接受业于孔子，他们之间应该有一个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自唐代以来，一般都认为这个环节是曾子，近代以来的大多数学者亦持这种观点。另有学者则认为，孔子和子思之间的环节不是曾子，而是子游。曾子和子游的思想本来就比较接近，同属于孔门后学中的“主内派”，子思的思想正是从这一派发展而来。

孟子立志学习孔子，就要像孔子一样积极出仕，通过参与政治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战国时期士阶层的活跃，各诸侯国设官开馆、招徕人才、礼贤下士的风气，正好为他提供了这样的条件。士本是一个社会阶层，在天子、诸侯、大夫、士的社会等级中，士是贵族中最低的阶层，又处在庶民之上。由于战国时代社会阶级的流动，“即上层贵族的下降和下层庶民的上升。由于士阶层适处于贵族与庶人之间，是上下流动的汇合之所，士的人数遂不免随之大增。这就导致士阶层在社会性格上发生了基本的改变”<sup>②</sup>。凡具有一定的知识、文化、技能，且在社会上产生一定影响的人，都可以成为士。士虽然政治地位较低，却成为当时最为活跃、最有影响力的阶层。不过，士地位的提高也使士这个阶层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成分变得十分复杂。其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纵横之士。纵横是合纵连横的简称，“合纵”，即“合众弱以攻一强”，就是许多弱国联合起来抵抗一个强国，以防止强国的兼并。“连横”，即“事一强以攻众弱”（《韩非子·五蠹篇》），就是由强国拉拢一些弱国来进攻另外一些弱国，以达到兼并土地的目的。由于当时各诸侯国都实行合纵连横的政治策略，纵横家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孟子》记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滕文公下》）景春所说的公孙衍、张仪就是纵横家的代表，是当时政治舞台上所谓的风

云人物，他们一发怒，诸侯都会害怕；他们安静下来，天下就太平无事。好不气派、威风，所以被视为“大丈夫”。但在孟子看来，公孙衍、张仪之流根本算不上是“大丈夫”，他们看人脸色行事，顺从主子的意志，不过是“以顺为正”的“妾妇”而已。真正的“大丈夫”，应该是以“仁”为“广居”，以“礼”为“正位”，以“义”为“正路”，他们站得直，行得正，坚定不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同上），具有崇高的精神境界。所以在孟子眼中，士首先代表一种精神信仰，一种责任担当，他们关注于人间的政治秩序和普遍利益，具有类似于近代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

作为一个阶层，士有其特殊的职责与身份。“士者，事也，任事之称。”（《白虎通·爵》）士有自己的事业，他们以“仕”显身，成为职业的政治家、管理者。《孟子》中记孟子答魏人周霄问：“古之君子仕乎？”明确肯定士人应该出仕。在他看来，“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滕文公下》）。士人出仕如同农夫耕田，都是一种职业。但是，“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君子对于出仕，又有着自己的道义与原则，他们“见危致命，见得思义”（《论语·子张》），“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所以对于出仕，他们又有自己的原则，不根据原则出仕，就如同钻洞扒缝一样，是一种可耻的行为。这样，士又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同时还代表一种政治理念、社会理想，而士人选择出仕，不过是要将这一理念付诸实践而已。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孟子的活动较简略，且有不准确的地方，而《孟子》关于孟子的活动则多有反映。据谭贞默《孟子编年略》：“孟子四十以前，讲学设教；六十以后，归老著书。其传食诸侯当在四十以外。”基本反映了孟子的生平活动。孟子为邹国人，其游说诸侯应当是从邹穆公开始的。故有学者认为，《梁惠王下》“邹与鲁鬪（hòng，争斗）”

章是孟子早期游说诸侯的记录。据该章，邹国与鲁国发生争斗，邹国的长官被打死三十多人，而邹国的百姓却在一旁见死不救，看热闹。这时孟子在邹国已有了一定的声望和影响，于是穆公便向孟子请教。周广业《孟子四考》说：“孟子之仕，自邹始也。时方隐居乐道，……会与鲁鬪，有司多死者，公问如何而可？孟子以仁政勉之。”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孟子实际是遇到了“人民为何不爱国”的问题。孟子认为不能以官吏甚至君主代表国家，国家的主体是民众，而非君主、官吏，后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即是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思考。百姓的冷漠，责任在官吏。邹国的官吏平时缺乏仁爱之心，对百姓的死活不闻不问，现在算是得到了报应。解决民众的“爱国”问题要靠“行仁政”，执政者只有执政为民，造福于民，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民本、仁政是贯穿孟子一生的核心思想，仔细考察可以发现，这些思想都是孟子在应对现实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孟子在邹国附近活动一段时间后，前往齐国。齐国是当时东方最强大的国家，由于稷下学宫的设立，更是成为战国时期文化的中心。稷下学宫兴办于桓公田午之时，在威王时进一步发展起来，至宣王、湣王时最为兴盛，到襄王、王建时逐渐衰落，及秦并六国、齐国灭亡而结束，前后大约经历了一百五十年的历史。由于稷下学宫采取多元并立、平等共存、争鸣驳难、融合发展的文化政策，当时的儒、墨、道、法、名、阴阳、小说、纵横、农家等各派著名人物，都曾登上稷下的学术舞台，奏出了一曲百家争鸣的交响乐。中国古代的百家争鸣主要是在齐国稷下学宫进行的。孟子一生曾两次来到齐国，荀子也曾在学宫“三为祭酒”，稷下学宫对古代文化贡献可谓大矣！孟子第一次到齐国正值齐威王执政，可能由于当时孟子的影响还不够大，《孟子》中未见其与齐威王的对话。不过，《告子》篇中所记载孟子与告子的论辩则发生在这一时期，孟子的言论多有不合逻辑之处，是其思想还未成熟的表现。

孟子在齐国未得到重视，无法施展抱负，这时听说宋偃王欲行仁政（《滕文公下》：“万章问曰：‘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于是前往宋国。孟子到宋国后，发现宋偃王身边多为奸佞小人，只有一位薛居州可称为善士，对宋偃王的仁政产生深深的忧虑。按照孟子的想法，“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仁政的动力在于君王的不忍人之心，而保证君主能够行仁政，就要在其身边安排大量的善士，对其劝诫、进谏，乃至影响、感化。故孟子一定程度上涉及到规范权力的问题，孟子说：“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所说的“大人”是指有德、有位，与君主关系密切且得到君主信任的人，只有这些人能够影响国君，纠正国君的过错。但孟子一方面想规范、引导权力，另一方面可以凭借的力量又十分有限，在他那里，“仁政如何可能？”是一个没有真正解决的问题。

孟子在宋国活动未果，不过却遇到了当时还是太子的滕文公（《滕文公上》：“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言必称尧舜，给后来的滕文公留下深刻印象。不久滕定公去世，滕文公即位，于是派人将已回到邹国的孟子接到滕国，协助其推行仁政，一时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不少人闻风而至。农家学派的许行从楚国来到滕国，“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本来属于儒家的陈相被其学说所吸引，成为许行的门徒，《滕文公上》记载的孟子与陈相的辩论，即发生在这一时期。不过，孟子虽然有机会得君行道，但滕国只是一个小国，不久齐人在滕国附近的薛筑城，直接威胁到滕国。滕文公问该怎么办？面对这样的问题，孟子也无法回答，只能说勉强为善罢了。在这种情况下，孟子意识到要推行仁政于天下，仅靠滕国的力量是不够的。这时孟子通过滕国的仁政实践已产生较大影响，于是率领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浩浩荡荡来到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孟子时年五十多岁。

孟子一到魏国，便受到梁惠王的接见，《孟子》开篇第一章即记录了二人相见的情景：“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由于涉及义利之辨，一开始便话不投机。除上面一章外，《梁惠王》还有四章记录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都是劝导其推行仁政。几年后，梁惠王去世，梁襄王即位，孟子“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于是离开魏国前往齐国。孟子第二次到齐国，时值齐宣王执政。《孟子》一书明确记载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多达十四处之多，另有一次虽只言“齐王”，但从内容看也应指宣王。另外像著名的“知言养气”章，记录的也是这一时期的事。孟子初到齐国时，与宣王的关系尚可，二人的对话态度和缓、气氛融洽，著名的有以宣王对牛的不忍人之心，启发其推行仁政等。但这种局面没有维持很久，公元前315年（齐宣王五年），燕国因燕王哙让国而发生内乱，齐国乘机出兵，很快攻下燕国。宣王向孟子请教：是否应吞并燕国？孟子从其民本立场出发，主张“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孟子这一看法实际是将民众的利益置于国家主权之上。不过孟子并不认为任何国家都有讨伐别国的权力，只有“天吏”也就是得到合法授权者才有资格征伐不道，救民于水火。但是齐国攻占燕国后，不仅不行仁政，反而“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完全违背了孟子的意愿，站在了燕国民众的对立面。于是孟子向宣王建议，尊重燕国人的意见，择立一位燕王，自己从燕国撤兵。但宣王没有听从孟子的建议及时撤兵，结果“燕人畔（叛）”，其他国家也出兵救燕，齐军因此大败。经历伐燕之事后，孟子对宣王大为失望，认识到他不是一个仁义之君，言谈中多有批驳、讥讽，常使“王顾左右而言他”。

在这种情况下，孟子决心离开齐国，当弟子充虞问：先生看上去似乎不高兴。可是之前您不是教导我们要不怨天、不尤人吗？孟子答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孟子有一个想法，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定有闻名于世的贤人出现。从周朝以来，已经七百多年了。从时间上说，已经超过了；从时势而论，也该有圣贤出现了。可是我的主张为什么行

不通呢？那么我只能说，老天大概还不想让天下得到平治，如果想让天下得到平治，当今之世，舍我其谁？我有什么不愉快呢？孟子就是带着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告别了当时的政治舞台，回到了自己的故里，教授子弟，著书立说，编写《孟子》一书。当一个人带着理想走入社会时，他往往是坚定、充满信心的。可是当理想遭到挫败，看不到希望的时候，依然能保持坚定的信念，恐怕只有孟子了。那么，孟子的自信来自哪里呢？这是因为孟子坚信一点：政治必须要符合人性，符合人性的政治才是最有前途的政治，仁政、王道较之暴政、霸道是符合人性的，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所以最终一定会实现。现在无法实现，只能说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若到来，必定是仁政、王道的时代。我们今天读《孟子》，脑海里会有一个鲜活的孟子形象：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而在当时人们的眼里，孟子则是“迂远而阔于事情”，他是迂阔、不切实际的。所以理想与现实是有反差的，当你坚守理想的时候，你很难被人们理解。固然，我们可以说孟子对人性的复杂性缺乏反省，对历史的看法也未免过于乐观，但孟子至少有一点是对的，真正的理想是需要坚守的。在坚守一百多年后，孟子的思想已在士人中间广为流传，成为其批判暴政、为民请命的精神动力；而在坚守了一千多年后，孟子的思想终于成为社会的指导思想，《孟子》一书也由子书上升为经书。至少在人们的观念中，王道战胜了霸道，仁政战胜了暴政。即便有残暴的君王如朱元璋之流想借助权力挑战《孟子》的历史地位，也难以逃脱失败的命运。所以理想在于坚守，只要它符合人性，符合天道，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即使暂时无法实现也不必怨天尤人。如果天下要得到平治，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两千年前孟子所坚守的仁政、王道，像一座灯塔为我们指引了前进的方向。

概括一下，孟子生平经历大致为：在邹国游历（四十岁左右）——第一次到齐国（齐威王执政）——到宋国（宋偃王欲行仁政）——在滕



国行仁政（滕文公行仁政）——到魏国（梁惠王执政）——第二次到齐国（齐宣王执政）——告老还家，著《孟子》。

## 二、孟子的思想学说

《孟子》一书的思想较为丰富，包含了孟子性善论、义利之辨、王霸之辨、民本、仁政等诸多思想内容。限于篇幅，这里主要对孟子的性善论、“民贵君轻”及仁政、王道思想做一介绍。

### 1. 性善论

孟子“道性善”是思想界的一件大事，也是对当时人性论的突破。据孟子弟子公都子介绍，战国时流行的人性论主要有三种，分别是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说，以及“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说与“有性善，有性不善”说（《告子上》）。其中，告子认为“食色，性也”，而“食色”本身无所谓善与不善；第二、三种人性论则分别着眼于环境与人性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以上观点虽有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将“人性”看作为一种客观对象、事实，根据人性的种种具体表现，对其作经验性的描述、概括，类似一种科学实证的研究方法。对于以上的言人性方式，孟子虽然并不一概反对，但认为其只是对人性的一种外在概括和描述，不足以突出人的道德主体性，无法确立人生的信念和目标，不能给人以精神的方向和指导，更不能安顿生命，满足人的终极关怀。故孟子言人性，不采取以上的理路，而是另辟蹊径，提出他对人性的独特理解。孟子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尽心下》）表明孟子亦承认“口之于味”“目之于色”等事实上也是一种人性，但又认为君子并不将其看作是人性。前一个“性也”，是一个事

实判断；后面的“不谓性也”，则是一个价值判断。孟子又认为，仁义礼智的实现，虽然一定程度上也要受到命的限制，但“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这里的“不谓命也”，同样是一种价值判断。因此，孟子性善论实际是以善为性论，因为“把善看作是性”与“性是善的”，二者是同义反复，实际是一致的，孟子性善论的核心并不在于人性为什么是善的，而在于为什么要把善看作是人性？以及人是否有善性存在？孟子正是顺着这样的思路，对其性善论做了论证和说明。

关于人有善性，孟子主要从两个方面予以说明。首先是继承了“天命之谓性”的传统，将善性溯源于形上、超越的层面，认为是天的赋予。其次又强调人有善性亦有着事实的根据，可以在经验世界中得到显现与证明，如“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公孙丑上》）。对于这段文字，以往学者往往看作是孟子对性善的证明，实乃大误。人性善是对人性的全称判断，是说人性的全部内容及表现都是善，这显然是不能靠有限的举例来证明的，若举雷锋助人之例来证明性善，同样也可以举小偷行窃之例来证明性恶，这样的举例是无限的。其实，孟子以上所论只是要证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就是人皆有善性，而人皆有善性与人性是善的虽有联系，但所指显然有所不同。人皆有善性当然也不可以通过有限的举例来证明，但由于它近乎一种事实，实际上是任何人都难以否认的。孟子举出此示例，意在使每个人都可以设身处地，置身其中，反省到自己也必生“怵惕恻隐之心”，并援之以手，更进一步反省到自己以往的生活亦有过众多类似的经历，从而洞见到内在善性的存在。这样就证明，人确有善性存在。

既然人有善性，孟子需要进一步说明，人为什么要把善性看作是真正的人性。对此，孟子又从“人禽之辨”“性命之分”“大体小体之别”三个方面做了论证。关于人禽之辨，如张岱年先生所言：“孟子所谓性者，正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之特殊性征。人之所同于禽兽者，不可谓人之性；

所谓人之性，乃专指人之所以为人者，实即是人之‘特性’。”<sup>③</sup>既然生活中谁都不愿被骂为畜生，这清楚不过地说明，人还有不同于、高于禽兽的特性，这些特性才能真正显现出人之为人的价值与尊严。故谈论人性只能以人高于、不同于禽兽的特性为人性，而不能以同于禽兽的特性（可称为兽性）为人性。那么，以善为人性对我们的实际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孟子又从“天爵”与“人爵”、人格平等、人生之乐等方面做了进一步说明。人生在世，其价值、意义何在？除了财富、权势、地位这些世俗的价值外，还有没有一种更为根本、更能体现人之为人的价值存在？孟子通过“天爵”“人爵”对此做了回答。“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告子上》）人爵指“公卿大夫”，即现实中的权势、地位；天爵指“仁义忠信，乐善不倦”，即内在的善性和对此善性的自觉、喜好。天爵的“天”有二义，一是指尊贵；二是指“此天之所与我也”。故天爵具有超越的来源，高于现实的人爵。古代的人将天爵置于人爵之上，“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体现了天爵、人爵的价值秩序；而今天的人修其天爵，是为了获取人爵，获取了人爵，便抛弃天爵，完全违背了天爵、人爵的价值秩序。所以在孟子看来，人的价值、意义不在于权势、地位，而在于善性、德性。人爵只有少数人可以获得，而天爵则是人人都具有的，是天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赋予，这就保证了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价值与尊严，都有实现其价值与尊严的可能，确立起人生的信念与方向。

在现实中，人与人是不平等的，这便是人爵得以产生的原因所在；但在不平等的现实面前，人们一直没有放弃对平等的向往与追求，所以古往今来许多思想家对平等做出深入思考与理论探讨。在儒家内部，首先对平等问题做出思考的是孟子，而孟子肯定人格平等，又是建立在“性善”论的基础之上。

成覿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滕文公上》）

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

孟子曰：“然。”（《告子下》）

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椽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尽心下》）

孟子将善性看作是人的价值与意义之所在，而善性又是天平等地赋予我们每一个人的，只要扩充、培养我们的善性，“人皆可以为尧舜”，这样便从根本上保障了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可能。虽然“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滕文公上》），人与人之间存在能力、才智的差别，存在着财富、地位甚至是阶级的不平等，但在人格上又是绝对平等的。现实中的达官贵人往往以堂屋之高、饮食之美、饮酒纵欲、驰骋田猎之乐炫耀于世，以显示他们的特殊与尊贵，然而这些“皆我所不为也”，不是我所追求的；我所追求的是充分实现自己的善性，是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我的所作所为符合古代的理想之制，符合天爵高于人爵的价值秩序，所以即使面对在财富、地位上优于我的达官显贵，我也无所畏惧，依然可以获得一种平等感。孟子的人格平等，是一种内在平等，一种精神上的平等，不同于法律、制度上的外在平等，不同于近代以来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它可以转化为追求外在平等的精神动力，可以为法律、制度上的平等提供精神、信仰上的支持。

孟子“道性善”实际包括了孟子对人性的内容与作用、人的价值与

意义、人的终极关怀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人们之所以对性善论感到不好理解，并产生种种误解，其中一个原因便是没有从孟子自身的理路出发，没有用孟子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而是将后人的思维带入其中。例如，很多学者将“孟子道性善”理解为“孟子认为人性是善的”，实际上《孟子》一书中只说“孟子道性善”“言性善”，而“道性善”“言性善”是宣传、言说关于性善的一种学说、理论，是不能直接等同于“人性是善的”。“人性是善的”是一个命题，是对人性的直言判断，而“性善”则是孟子对人性的独特理解，是基于孟子特殊生活经历的一种体验与智慧，是一种意味深长、富有启发意义的道理。理解孟子性善论，固然要重视孟子提出的种种理由与根据，更为重要的则是要对孟子“道性善”的深刻意蕴有一种“觉悟”，而这种深刻意蕴绝不是“人性是善的”这样一个命题所能表达得了的。如果一定要用命题表述的话，“道性善”也应表述为：人皆有善性；人应当以此善性为人性；人的价值、意义在于充分扩充、实现自己的人性。

## 2. “民贵君轻”

我国古代有源远流长的民本思想，早在盘庚时期就有了“重我民”“施实德于民”的认识，《古文尚书·五子之歌》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说明我国古代先哲很早就懂得了民在国家政治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西周之初，周公提出“敬德保民”的思想，劝诫国君要体谅小民“稼穡之艰难”（《尚书·无逸》），标志着古代民本思想的萌芽和产生。到战国时，孟子将民本思想发展到一个高潮，提出了“民贵君轻”之说。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

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尽心下》）

孟子突出了民的地位，将其放在社稷（国家）、君主之上，认为“民为贵”。“贵”是贵重、尊贵之意，相当于今天所说“最为重要”“最有价值”。故以上是说，人民与社稷和君主相比是最为重要、最有价值的，或者说，人民是国家的根基、基础，是国家的价值主体。这既是从国家治理的重要程度来讲的，也是对人民国家主体资格的肯定；既是一个事实判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也是一个价值判断。孟子从长期的历史经验中认识到“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民心的向背往往决定着政权的兴衰得失，故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对于国家政权是最为重要的。

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圻也。”（《离娄上》）

不过孟子的“民贵”说，不仅是对政权来源的认识、理解，同时也是对政权合法性的思考，认为人民的利益构成君主权力的基础，人民的生命、财产是最为珍贵的，是设立国家、君主的唯一理由与根据，君主应尽职保障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否则便不具有合法性。国家、君主的设立既然是为了民，是为了人民的需要，那么，“民贵君轻”便是自然合理的了。“民贵”说的前一个方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可称为“民心”说，主要是针对君主、统治者而讲的；后一个方面，则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人道主义思想，是一种价值理念和信仰，是孟子抨击暴政，“处士横议”的精神根源和动力，也是孟子民本思想中最核心、最有价

值的部分。

由于“民为贵”，人民是国家的价值主体，人民的好恶决定政治的具体内容，“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君主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应注意考察民意。以官吏的任免而言，其进其退，都不能仅仅听取少数人的一面之词，而应以人民的意志、意愿为根据。他说：

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梁惠王下》）

甚至对别国的讨伐，也要征得别国民众的同意。在谈到齐国应否征伐燕国时，孟子提出，“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梁惠王下》）。将燕国民众的同意不同意作为出兵征伐的唯一根据。更进一步，君主自身的统治，也应当得到“民”的认可。虽然孟子并不认为君主的权利是直接来自于民，而是保留了“君权天授”的形式，但其思想中显然也包含了对君主统治合法性的思考，认为唯有为“民”所接受和支持，君主的统治才具有合法的形式。换言之，民众的认可和接受，构成了判断、衡量君主统治合法性的尺度。孟子对“君”“民”关系的这种理解，显然已超出了“君”应重视、关心“民”这一类简单的规定，而包含了对人民国家主体资格的肯定。孟子以舜继尧位为例，说明天子之位既是来自天，又是来自民，是“天与之”“人之与”，这是其统治合法性的基础。孟子认为“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表明天下并非

天子个人的私有物，“这种区分的内在含义，在于肯定天下非天子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之人或天下之民的天下”<sup>④</sup>。故在孟子看来，天子不过是受“天”与“民”委托的管理者，只具有管理、行政权，而不具有对天下的所有权。正因为如此，孟子肯定了汤武革命的合理性，不把君位看作是绝对的，如果君主不能保民，不能推行仁政，便可易位，甚至诛之、杀之。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

同样，孟子也反对臣对于君的一味顺从，认为“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滕文公下》）。他向齐宣王进言道：“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讎。”（《离娄下》）臣并不是完全依附于君，对于“贵戚之卿”来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这体现了社稷“贵”于君主）；对于“异姓之卿”来说，“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万章下》）。与君位相比，臣更应关注的是人民的利益与福祉，应该“守先王之道”“乐道忘势”，应该直言进谏，为民请命，而孟子之所以有如此主张，显然就在于“民贵君轻”的价值理想与信念。

孟子的“民贵君轻”说将古代的民本思想发展到一个高峰，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成就，不过仍具有一些时代的局限。这是因为，孟子虽主张“民为贵”“君为轻”，但并不否认君主的特权地位，他认为君主的权力



是“天与之”，是上天的赋予——尽管此天以人民的意志为根据，而一般的人想要成为天子，“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才可以实现。天子即位之后，除非残暴“若桀、纣者”，否则天也不会废弃（《万章上》）。这是一种“君权天授”的思想，是一种神权政治，与近代主权在民的民主思想有所不同。同样，孟子虽肯定国家行政措施当以人民意愿为根据，认为人民的利益构成君主权力的基础，但并不主张人民可以直接参与国家政治管理，并未赋予人民监督、节制和罢免君主的权利，孟子所关注的主要是人民的生存（生命、财产）权以及受教育权，而非人民的政治参与权。诚如梁启超所言：“孟子仅言‘保民’，言‘救民’，言‘民之父母’，而未尝言民自为治，近世所谓 of the people（民享）、for the people（民有）、by the people（民治）之三原则，孟子仅发明 of 与 for 之二义，而未能发明 by 义。”<sup>⑤</sup> 孟子虽然突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但其“劳心”“劳力”说又否定了民（“劳力者”）的政治权利，肯定了人在政治上的不平等。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滕文公上》）如果说“劳心”“劳力”只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分工以及彼此间的“通功易食”——“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这种划分尚有合理之处的话，那么，孟子将其与政治学意义上的社会等级混同在一起，并用前者论证后者的合理性，则走向了偏差。按照这样的规定，“治人”或政治管理就成了少数“劳心者”的特权，而广大的“劳力者”则只能“治于人”，而不能积极地去“治人”，不能参与到社会的管理决策中去。而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之一，便是肯定每一个合乎法定要求的社会成员都具有参与社会决策的权利，它的前提，是承认每一个社会成员在社会政治结构中具有平等的地位。在这些方面，孟子的“民贵君轻”说与现代民主思想显然是有所不同的。

### 3. “仁政”与“王道”

孟子生活的战国中后期，正是古代社会大变动的前夜，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演变为战国时期的诸侯兼并，诸侯间战争愈演愈烈，“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离娄上》）。这些战争不仅对社会生产造成极大破坏，也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沉重灾难。《孟子》记梁惠王曰：“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梁惠王上》）就是魏国对外发动的几次著名战争。面对战争的惨败，梁惠王不是汲取教训，偃旗息鼓，反而急于报仇雪恨，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在兼并战争的刺激下，诸侯国君为了取胜不择手段，完全撕破了三代以来礼乐征伐的温情面纱。顾炎武说：“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日知录·论周末风俗》）孟子反对诸侯间的战争，他站在民本立场提出了“仁政”说，对孔子“仁者爱人”“为政以德”的思想做了进一步发展。孟子“仁政”说的思想基础是民本论，其根据则是性善论。孟子说：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

“不忍人之心”即“恻隐之心”，也就是人皆生而即有的仁爱、同情心。“先王”指尧舜和三代之王，孟子认为“先王”将生而即有的“不忍人之心”施之于社会政治中，于是就有了“不忍人之政”，即“仁政”。只要实行仁政，治理天下便可“运之掌上”。在孟子看来，推行仁政不仅富有成效，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原因就在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之君王与古之“先王”一样，也都有仁爱、同情之心。孟子在游说齐宣

王时，以宣王不忍杀牛衅钟而“以羊易之”，“见其生，不忍见其死”，启发齐宣王扩充此仁心，即可“保民而王”（《梁惠王上》）。孟子将仁政寄托在君主的不忍人之心，似天真、不切实际，如后人所批评的，是“迂远而阔于事情”；但孟子以仁心启发宣王，不过是一种进言的策略，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无奈之举。孟子提倡仁政，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相信君王的不忍人之心，而在于坚信“民为贵”，认为民众的生命、财产是最为珍贵的，故以民众代言人的身份登上当时的政治舞台，要求统治者放下屠刀，实行仁政，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对于孟子而言，性善论只是实行仁政的可能条件，民本论才是其根本原因。故在《孟子》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孟子与齐宣王之间的另外一幕：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梁惠王下》）

孟子从某人受人之托，照顾朋友的妻室儿女，却使其受冻挨饿；被任命为士师的高官，却不能管理好其下属，“则如之何”的一步步追问，意在提醒宣王注意，君主亦不过是受天之托来管理民众，如果“四境之内不治”，同样面临着“如之何”的问题。故在孟子看来，仁政绝不仅仅是君主的一种施舍、怜悯，而是其应尽的责任与义务，是其获得统治地位的理由和根据。而从“王顾左右而言他”的表现来看，孟子的主张显然是宣王自己也无法完全否认的。

孟子通过总结三代“废兴存亡”的历史教训指出：“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离娄上》）认为天子不施行仁政，便不能保全四海；诸侯不施行仁政，便不能保住社稷；大夫不施行仁政，便不能保住宗庙；士和庶人不施行仁政，便不能保全生命。他像孔子一样，一生中周游列国，游说魏、齐等国的君主，希望他们能效法尧、舜以及三代之王，“治民之产”，施行仁政，结束战乱，使人民过上安定、富裕的生活。

孟子曰：“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离娄上》）

尧、舜等圣人是人伦的极致，是君道、臣道的最高榜样。后世当效法尧、舜，“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而尧、舜所体现的君道、臣道不过就是仁而已。孟子又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离娄上》）认为施行仁政不仅要有善良之心和好的名声（“仁心仁闻”），同时还应有一套具体、可供操作的制度。只有其中的一项，“徒善”或“徒法”，都是不能真正实现仁政的。只有“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也就是扩充不忍人之心，急民所急，想民所想，同时又“遵先王之法”，这样才能达到“仁覆天下”的效果。故在仁政的问题上，孟子不仅重人治，亦重法治，其所谓“法”主要是指“先王之法”或“先王之道”。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梁惠王上》）民众与士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具有了固定的“恒产”，才能

有为善的“恒心”。如果没有“恒产”，人民生活陷入困顿，也就没有了“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所以先王、明君施行仁政，首先要“制民之产”，设计相应的经济制度，使民众“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同上）。具体讲，就是要“正经界”，均井田；“薄税敛”，“省刑罚”；“去关市之征”，废除市场税等。孟子说：

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滕文公上》）

“正经界”就是要明确土地的所有权，避免暴君污吏对人民土地、财产的侵夺，故孟子视其为“仁政之始”，认为是施行仁政首先要做的事情。就孟子承认人民的土地所有权而言，他是肯定土地私有的。但春秋战国以来出现的土地私有，虽然调动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富国强兵，也暴露出相应的弊端，国家聚敛无度，社会贫富分化，致使“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有鉴于此，孟子以恢复古代井田为名，提出了一个公有、私有相混合的土地所有模式，其具体内容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滕文公上》）在这个方案中，孟子既肯定了私田，也保留了公田。肯定私田，是为了鼓励生产，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保留公田，则是为了使百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讲，“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强调首先要治好公田，然后才能治理私田。但就施行仁政而言，他更重视的是私田，要求每家都有“百亩之田”可从事生产，统治者“勿夺其时”，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仁政、王道。人民有了“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后，国家还应“薄其税敛”，避免对人民的横征暴敛。

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已较为繁荣，出现了集市贸易，孟子主张“关市讥而不征”，反对统治者与人民争利，将其作为仁政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于市场，提供空地储藏货物却不征税，如果滞销，就依法收购不让其长期积压。对于关卡，只稽查而不征税。对于耕田的人，实行助法而不征税。对于人民的住宅，不征收额外的税钱。这样，天下之民便会欣然归附，“如此，则无敌于天下”（《公孙丑上》）。

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滕文公上》）人的伦理生活高于物质生活，在“制民之产”，人民的生活得到基本保障后，便需要“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培养人民的向善之心。仁政、王道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富而教之”，实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滕文公上》）的和谐伦理社会。

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统一已成为大的趋势，对此孟子亦持肯定的态度。孟子在回答梁襄王问“天下恶乎定”时，明确肯定“定于一”（《梁惠王上》），表明在孟子看来，只有统一才能实现天下的安定。但当时各国都将统一的方式寄托在暴力上，希望通过富国强兵、合纵连横统一天下，正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言：“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子则大义凛然，逆潮流而动，倡仁政，反霸道，“述唐虞、三代之德”，提出了“以德服人”的王道思想。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公孙丑上》）

孟子主张用“以德服人”的“王道”统一天下，反对“以力服人”

的“霸道”，也就是反对法家以严刑峻法驱民耕战，凭借富国强兵的实力和暴力来统一天下。因为前者符合人民的普遍利益，体现了对人民生命、财产和意志的尊重；后者则是从统治者的个人私利出发，是为了满足统治者个人的私欲，相反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的灾难，是违背人民的意愿的，它虽可以称霸一时，但不可长久。孟子说：

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离娄上》）

“弃于孔子者”即违背了孔子的价值原则，具体讲，就是违背了“民为贵”的价值原则。在孟子看来，孔子的精神就是“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公孙丑上》），认为人民的生命高于君主、天下之位，天下虽大，亦不能以牺牲民之生命为代价。这当然是一种很高的人道主义和价值理想，商汤、周文王实行仁政、王道，正体现了这种价值理想，而齐桓、晋文及当时之诸侯攻伐征战，违背了这一价值理想，“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

孟子曾向齐宣王进言，称其试图用“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的方式，以实现“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大欲”，无异于是“缘木求鱼”（《梁惠王上》），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只有实行仁政、王道，“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同上），才能真正统一天下。可见，仁政、王道不仅体现了“民为贵”的价值原则，同时还可以“得民心”，是富有成效、切实可行的。孟子说：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谿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公孙丑下》）

孟子以商汤伐桀，“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梁惠王下》），说明“仁人无敌于天下”（《尽心下》）。他分析当时的形势，认为“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公孙丑上》）基于这种认识，孟子甚至对《尚书·武成》篇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持怀疑态度：“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尽心下》）显然，孟子将正义战争理想化了，他的“以德服人”“仁人无敌”的思想在当时也不免受到“迂远”之讥。但孟子重视人民的力量，关心民众的疾苦，特别是将民众的生命、财产看作是最为珍贵的，认为任何统治者只有行仁政、王道，维护民众的生命、财产，才最有资格也最有可能统一天下，这种人道主义思想无疑是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历史的实际。

### 三、《孟子》的地位及影响

《孟子》一书是由孟子晚年与弟子万章等编著，《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认为《孟子》一书实为七篇。《风俗通义·穷通》则说：“退与万章之徒序《诗》、《书》、仲尼之意，作书中、外十一篇。”《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亦著录《孟子》十一篇。东汉赵岐《孟子题辞》说：“于



是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sup>⑥</sup>。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之者也。”可见所谓十一篇是在七篇的基础上，再加上《外书》四篇。但赵岐对《外书》四篇已有所怀疑，认为“似非孟子本真”，此四篇后已失传。至于今本《外书》，一般认为是明人姚士粦伪作。

《孟子》今存七篇，分别为：《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每篇各分上下，共十四卷。《孟子》一书记载孟子的游说活动，并记录孟子的“仁政”“性善”“义利之辨”“存心”“养性”等思想。作为辩论对象，还保存了杨朱、许行、告子的思想材料。

《孟子》一书可能在战国时已形成，并在社会上流传。据《韩非子·显学》，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孟氏之儒”为八派之一，与“孙氏之儒”（荀子）并列，是孔门内部较有影响的一派。不过自秦汉以降至两宋以前，《孟子》一书地位一直不高，被当作一般的子书看待。司马迁在《史记》中列有《孟子荀卿列传》，将孟荀并称，说明在当时人们心目中二人地位相当，学术界称为“孟荀齐号”。不过就对汉代经学的影响而言，孟子似乎都不如另一位儒者荀子大。汉代儒学以经学为主体，孟子、荀子虽然均传授六艺，但由于荀子差不多活到“六王毕，四海一”的战国后期，六经多是由他才传到后代，汉初的经师，如毛公、申公、穆生、白生、张苍、贾谊、大小戴等，直接或间接都是出于荀子之门，所以荀子与汉代经学有着更密切的关系。清人汪中说：“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盖自七十子之徒既歿，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其揆一也。”<sup>⑦</sup>梁启超亦称：“汉世六经家法，强半为荀子所传，而传经诸老师，又多故秦博士，故自汉以后，

名虽为昌明孔学，实则所传者仅荀学一支派而已。”<sup>⑧</sup> 汉代儒学除经学外，亦包括子学，虽然孟子倡民本、行仁政，其流风余韵亦波及汉代诸子，但相比较而言，荀子“隆礼重法”，注重外王事功，更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故亦更受到时人的重视。“汉世儒者，非仅浮丘伯、伏生、申公一辈博士经生，大部出自荀卿之学；即其卓称诸子，自陆贾以下，如扬雄、王符、仲长统，及荀悦之伦，亦莫非荀卿之传也。盖两汉学术，经学固云独盛，然因承先秦诸家之余风，子学述作亦复不少，其列属儒家者，大抵为荀卿之儒也。吾人读其书，荀卿之色彩颇浓，申、韩之绪余，亦往往杂出乎其间。……此其所谓儒，盖荀卿之儒耳。”<sup>⑨</sup>

及至唐代，孟子的地位虽有提高，但仍未有根本改善。据学者考证，唐高祖、太宗、高宗三朝，争论国子学当祭“周孔”还是“孔颜”；唐太宗时，增加从左丘明到范宁二十二位儒者从祀孔庙；唐玄宗封颜渊为“亚圣”和“兖国公”，封“孔门十哲”和“七十子”为侯、伯，而孟子却只字未被提及。当时科举考试的“明经”科目中有《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周易》《尚书》《毛诗》“九经”，《论语》和《孝经》被列入“兼经”，而《孟子》一书没有资格入选<sup>⑩</sup>。故由汉至唐，荀子的影响似超过孟子，而彼时所谓儒学，大抵缘饰以经学，阴染有法意，“霸王道杂糅之”，多由荀学发展而来。“三代以下之天下，非孟子治之，乃荀子治之。”

宋代以后，经学衰落，理学兴起，儒学形态再次发生变化：一是由六经转向四书，二是由章句训诂转向性命义理。在这一过程中，孟子的地位不断提升，并与道统结合在一起，成为儒家正统的代表。汉魏以降，佛老流行，儒学衰微，逮至唐代，韩愈崇儒学，批佛老，首倡道统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sup>⑪</sup> 儒家自

古以来就有一个道统的传授，它从尧舜时代就已经开始，远比佛老久远，这一传授系统后经孔子传与孟子，孟子以后道便不传。韩愈的道统说得到宋明理学家的普遍认可，“伊洛兴起，那时的学术风气又变了。他们看重‘教’更过于看重‘治’。因此他们特别提出《小戴记》中《大学》这一篇，也正为《大学》明白地主张把‘治国’、‘平天下’包括到‘正心’、‘诚意’的一条线上来。于是孟子和孔子更接近，周公和孔子则更疏远。在韩愈以前，常还是‘周孔’并称的，到伊洛以后，确然变成为‘孔孟’并称了……他们之更可看重者，也全在内圣之德上，而不在其外王之道上。于是远从《尚书》‘十六字传心诀’，一线相传到孔孟，全都是‘圣学’，不再是‘王道’”<sup>⑫</sup>。按照理学家的看法，孔子之后儒家的道统谱系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与这一谱系对应的，便是《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书。故孔子之后，真正继承道统的是曾子、子思尤其是孟子，其言性命天道，功绩反在尧舜周公之上。“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言。如仲尼只说一个‘仁’，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sup>⑬</sup>“古之学者便立天理，孔孟而后，其心不传，如荀、扬皆不能知。”<sup>⑭</sup>孟子之名逐渐列于孔子之后，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孟子》一书也“升格”为经，悬为科举功令，成为中国士人必读的官方教科书。“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sup>⑮</sup>“夫《孟子》之文，粲若经传，……其文继乎六艺，光乎百氏，真圣人之微旨也！”<sup>⑯</sup>“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sup>⑰</sup>“《论》《孟》如丈尺权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见得长短轻重。……今人看《论》《孟》之书，亦如见孔孟何异？”<sup>⑱</sup>

孟子的地位也得到官方的认可。熙宁四年（1071）二月，《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的科目之中。熙宁七年（1074），支持王安石变法的经学家常秩，请立孟轲像于朝廷。元丰六年（1083）十月，

孟子首次受到官方的封爵，诏封为“邹国公”。元丰七年（1084）五月，官方首次批准，允许孟子配享孔庙。政和五年（1115），政府方面承认兖州邹县所建的孟庙，诏以乐正子配享、公孙丑以下十七人从祀。宣和年间（1119—1125），《孟子》一书首次被刻成石经，成为“十三经”之一。到元朝的至顺元年（1330）元文宗加封孟子为“亚圣公”，孟子“亚圣”的地位终于确立<sup>⑨</sup>。故宋代以后，孟子的影响又彻底压倒荀子，《孟子》一书也随“四书”的广泛传播，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后期产生了深远影响。

#### 四、《孟子》的注疏及版本

阅读《孟子》，离不开古人的注疏。关于《孟子》的注本，重要的有东汉赵岐《孟子章句》、南宋朱熹《孟子集注》、清焦循《孟子正义》等。

赵岐（？—201），字邠卿，京兆长陵县（今陕西咸阳）人。初名嘉，字台卿，因避难而改名。东汉末年轻学家。汉桓帝时，因得罪京兆尹唐瑗，赵岐全家被害，自己只好隐姓埋名，逃至北海卖饼，后被孙嵩救至家中，藏于复壁内数年。唐瑗及其家人死后，赵岐得到大赦，才得以重见天日。但又遇到两次党锢之祸，可谓一生历经坎坷。赵岐的《孟子章句》，是汉代几家《孟子》注释中唯一完整留存至今的。不仅反映了汉代《孟子》研究的状况和水平，在整个孟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可谓是孟学史的发端之作，意义重大。《十三经注疏》中《孟子注疏》收入的就是赵岐的注。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世称朱文公。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尤溪）。南宋著名的理学家，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传统社会后期儒学的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朱熹十九岁中进士第，后任泉州同安县（今属福建）

主簿，开始了仕途生涯。六十五岁时，应召入都（今杭州），官拜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为宁宗讲《大学》。朱熹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希望通过匡正君德来限制君权，引起宋宁宗和执政韩侂胄的不满，在朝仅四十六日，便被解职。不久，在韩侂胄的指使下，朝廷发动了“庆元党禁”，斥道学为伪学，斥朱熹为“伪学魁首”，朱子的门人或流放，或坐牢，遭到严重打击。朱熹虽身处逆境，仍著述不辍，希望在有生之年建构起自己的理学体系，使道统后继有人。庆元六年（1200），朱熹去世，时年七十一岁。朱熹的《孟子集注》收入《四书章句集注》之中，与《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一起构成朱子的四书学体系。朱熹注《孟子》，注重义理的发挥，并申之以己意，实际是将《孟子》纳入自己的理学体系之中，代表了与汉唐章句之学不同的治学风格。不过，朱熹虽然重视义理，但对文字训诂并不偏废，往往有独到见解，又大量引用了宋代学者的观点，保留了一批珍贵资料，有着重要价值。宋以后，元、明、清三朝都以《四书章句集注》为官方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孟子集注》随《四书章句集注》一起，成为传统社会后期的官方哲学，产生重大影响。

焦循（1763—1820），字理堂，一字里堂，江苏扬州人。清代经学家。嘉庆六年（1801）中举人，后应礼部试不第，随即返乡侍奉母亲，不仕。母亲卒后，托疾闭户，建雕菰楼，读书著述其中，足不踏入城市有十余年。焦循治学广博，对《周易》《论语》《孟子》三书犹有精深研究。据焦循自述，其从弱冠时就好读《孟子》，对以往经疏中的不当之处深感不满，立志为其作正义。嘉庆二十一年（1816）冬，焦循与儿子焦廷琥先用近两年时间，博采历代有关《孟子》及赵注之论述，编次为《孟子长编》三十卷。《长编》编成后，焦循再就中所录删繁补缺，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春完稿。但校对、誊录

未半，焦循即去世。其子焦廷琥秉承父志，完成《正义》余下的工作，但未及出版也因病而终。临终前委托其叔叔焦征以完成《正义》的刊刻印行。道光五年（1825），《孟子正义》由焦征缮清、付刊问世。所以，《正义》一书实际成于焦循、焦廷琥、焦征三人之手，是凝聚了兄弟父子的心血之作。焦循成长于考据学极盛的乾隆年间，他接受了吴、皖两派经学思想之精义，形成考据与义理相结合的学术取向。其《正义》虽然是为赵岐《注》做疏，但又突破了“疏不破注”的成法，对于赵注，既申其义，又补其注，同时还正其误，存其疑，被称为清代“新疏家模范作品”。《正义》详于名物训诂，虽然对于义理也有心得，其往往淹没在浩繁的疏文之中，有胶柱鼓瑟之病，这点是需要注意的。

《孟子》的版本，重要的有宋刻巾箱本、宋刻大字本、明崇祯十三年（1640）锡山秦氏求古斋刻本、清乾隆间武英殿刻本、清嘉庆道光间江都焦氏雕菰楼本等。本书以常见的《十三经注疏》本为底本，同时参考其他版本，根据文意择善而从。底本改动之处一般会在注释中加以说明，个别虚词、异体字的改动，因不影响文本的理解，不做专门说明。本书参考了阮元的《校勘记》，尤其是刘玉才教授主编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特此说明。

- ① 持此说者有元代程复心《孟子年谱》，清代陈宝泉《孟子时事考征》、狄子奇《孟子编年》等。
- ②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13页。
- ③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4—185页。
- ④ 杨国荣《儒家政治哲学的多重面向——以孟子为中心的思考》，《浙江学刊》2002年第5期。
- ⑤ 梁启超《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收入《饮冰室专集》2册，台北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36—37页。

- ⑥ 此句也有断为《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但《孝经》为一独立的作品，不应收录于《孟子》中，故不从。
- ⑦ (清)汪中《荀卿子通论》，见王先谦《荀子集解》，《诸子集成》第2册，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版，第14—17页。
- ⑧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
- ⑨ 徐平章《荀子与两汉儒学》，台北文津出版社1988年版，第179页。
- ⑩ 参见徐洪兴《唐宋间的孟子升格运动》，《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值得注意的是，东汉赵岐在注解《孟子》时，曾把孟子尊为“亚圣”，还提到西汉文帝时设置过《孟子》的“传记博士”。可“亚圣”之名，当时未得到官方认可过；而“传记博士”之说，不见于《史记》《汉书》的记载，后人对此多有疑窦。即使存在也为时很短，没有产生过较大影响。
- ⑪ (唐)韩愈《原道》，见《韩愈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页。
- ⑫ 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96—297页。
- ⑬ (宋)程颢、程颐《二程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6页、221页。
- ⑭ (宋)张载《经学理窟·义理》，见《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73页。
- ⑮ (唐)韩愈《送王秀才序》，见《韩愈全集》，第212页。
- ⑯ (唐)皮日休《请孟子为学科书》，见《皮子文藪》卷九，《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 ⑰ (宋)程颢、程颐《二程集》第1册，第322页。
- ⑱ 同上，第205页。
- ⑲ 参见前引徐洪兴《唐宋间的孟子升格运动》。





# 孟子

## 梁惠王上

1.1 孟子见梁惠王<sup>[1]</sup>。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sup>[2]</sup>？”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sup>[3]</sup>。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sup>[4]</sup>？’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sup>[5]</sup>。万乘之国<sup>[6]</sup>，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sup>[7]</sup>。苟为后义而

“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礼记·大学》）

先利，不夺不餍<sup>[8]</sup>。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 [ 注释 ]

[1] 梁惠王：即魏惠王（前 369—前 319 年在位），战国时魏国国君。名罃。“惠”是其死后的谥号。魏惠王在位时，因迫于秦国的压力，将都城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故亦称梁惠王。 [2] 以上三句意为，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那么将给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利呢？亦：则。 [3] 以上两句意为，大王何必说利？只有仁义罢了。亦：只；仅仅。 [4] 家：大夫的封邑，又称采地。 [5] 此句意为，上下互相争夺利，国家就危险了。交征：互相争夺。征：夺取。 [6] 乘（shèng）：量词。古代用四匹马拉的一辆兵车叫一乘，一乘有甲士三人，普通兵卒七十二人，共七十五人。诸侯国的大小以兵车的多少来衡量，万乘之国为当时的大国。 [7] 以上三句意为，万份中占有千份，千份中占有百份，不算是不多。 [8] 以上两句意为，如果人们把义放在利之后，不全部夺取就不会满足。餍（yàn）：满足。

### [ 点评 ]

本章为《孟子》一书首章，从梁惠王称孟子为“叟”，知是孟子游历晚期事，列为首章，关乎全书主旨也。据学者考证，孟子在滕国推行仁政失败后（参见 2.13、2.14、2.15），听说魏惠王招贤纳士，于是率领门徒，“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6.4），浩浩荡荡来到魏国。孟子到

魏国时，梁惠王正经历了一连串的军事失败，故急迫地问：能给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于是二人有了这场关于义利的著名对话。

朱熹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故这段文字被列为《孟子》的开篇，可能不是偶然的，它既是对当时社会状况的反映，也是理解《孟子》一书的关键。孟子生活的战国中后期，周代以来的礼乐制度彻底崩坏，如何重建政治秩序成为急迫的现实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看法。法家主张对内富国强兵，对外武力扩张，希望通过暴力重建政治秩序，其所行乃霸道；而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则主张行仁政、王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7.9），希望以仁义重建政治秩序。故孟子的义利之辨不只是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而首先是政治秩序重建，是行霸道还是王道的问题——以仁义重建政治秩序是为王道，以暴力实现政治统治则为霸道。需要说明的是，梁惠王“何以利吾国”的“利”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利，不是民众的物质利益，而是指攻占别国的土地，杀戮别国的民众，是“欲以富国强兵为利”（赵岐注），实际是梁惠王扩张疆土，臣服秦、楚的“大欲”。故针对梁惠王的发问，孟子明确回答：“大王何必说利？只有仁义罢了。”孟子所说的义或仁义是指公正、正义，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良善关系。孟子的义利之辨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层面。义利之辨的第一个层面是说，我们不能在一个没有道德原则，没有正义、秩序的环境中去追求利，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人们还一味地追求利，那只能是诸侯想着去取代天子，大夫想着去杀害诸侯，士想着

篡夺大夫，只能使社会陷入更大的混乱之中。孟子告诫人们，在一个无序、混乱的社会中，首先不应该想着如何去追求利，而是建立起公正、正义，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良善关系。

司马迁说：“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司马迁这里所说的利，就是孟子所否定的利，也就是只讲个人需要不讲道义原则的利。所以我们不应只看到利，还应看到利背后的义，只有建立起义，建立起合理、公正的秩序，才能更好地追求利。这是两千年前孟子给我们的启示。

需要说明的是，孟子并不一概反对物质利益。《孔丛子》中子思与孟子的一段“对话”，将义利的关系讲得更为清楚。

孟轲问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

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义，固所以利之乎？”

子思曰：“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乱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杂训》）

这段文字与前面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显然具有某种联系。前文孟子主张“何必曰利”，这里“子思”却主张“先利之”；前面是孟子教导梁惠王，这里却是子思教导孟子。说明这段文字是针对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而发，

是对前者的一个补充和回应。不过据学者考证，子思与孟子年代相距较远，二人不及相见。故《孔丛子》中的这段文字并没有事实的根据，而可能是出于子思或孟子后学之手，意在说明经过子思的“教诲”，孟子也重视起民众的利益了。这虽然是虚构，但衡之以孟子“制民之产”的主张，也是符合孟子思想的。《孟子》上文中的“利”是指君王的“大欲”，故孟子主张“何必曰利”，而此段文字中的“利”是指民众的物质利益，故“子思”主张“先利之”。在孟子等儒家学者看来，执政者本来就是为天下百姓谋取、创造利益的，执政者若奉行仁，遵守义，百姓安居乐业，各得其所，“此皆利之大者也”；若执政者抛弃了仁，违背了义，百姓的生活得不到保障，流离失所，甚至铤而走险，“此为不利大矣”。所以，义和利实际是统一的，或者说应该是统一的，这里“义”是指道义和公正、正义，“利”则是指社会的整体利益，指民众的物质利益。强调义利的统一，是孟子义利之辨的第二个层面。

故本章虽然是谈义利，但与孟子所主张的仁政、王道也是密切相关的。以民众的物质利益为重，对内实行仁义的是仁政，通过“得民心”使天下归附的是王道；而“以富国强兵为利”，片面追求物质利益的是暴政，通过武力扩张使天下臣服的是霸道。重视义还是重视利以及如何看待义利的关系，乃区分仁政与力政、王道与霸道的重要根据。故以下几章主要围绕仁政、王道展开论述。本章可与12.4合看。

1.2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sup>[1]</sup>，曰：“贤者亦乐此乎？”

贤者与民偕乐，故能乐此乐；不贤者不与民偕乐，虽有此乐而不能乐。

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sup>[2]</sup>：‘经始灵台<sup>[3]</sup>，经之营之，庶民攻之<sup>[4]</sup>，不日成之。经始勿亟<sup>[5]</sup>，庶民子来<sup>[6]</sup>。王在灵囿，麇鹿攸伏<sup>[7]</sup>，麇鹿濯濯<sup>[8]</sup>，白鸟鹤鹤<sup>[9]</sup>。王在灵沼，于物鱼跃<sup>[10]</sup>。’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麇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sup>[11]</sup>：‘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sup>[12]</sup>。’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 [ 注释 ]

[1] 顾：视；看。 [2] 《诗》云：此章所引为《诗·大雅·灵台》，记述文王营造灵台之事。 [3] 经始：即“始经”。经：测度。指测量灵台的位置，以便建造地基。灵台：祭祀神灵之台。故址在今陕西西安西北。孟子在这里做了引申，认为文王与民同乐，故民称其台为灵台。灵是美好的意思。 [4] 攻：建造。 [5] 亟：急。 [6] 子来：像儿子一样前来。 [7] 麇(y u)鹿：牝鹿。攸伏：安然俯伏。攸：安然貌。 [8] 濯(zhuó)濯：肥胖而光滑的样子。 [9] 鹤鹤：羽毛洁白的样子。 [10] 上引诗句意为，开始建灵台，测量又经营。百姓来建造，很快就造好。王说莫要

急，百姓更卖力。文王到灵囿，母鹿卧不惊。母鹿肥又美，白鸟羽毛洁。文王到灵沼，满池鱼儿跳。於(w)：赞叹词。坳(rèn)：满。 [11]《汤誓》：《尚书》中的一篇。记载商汤讨伐暴君夏桀的誓词。 [12]以上两句意为，这太阳何时陨落？我们和你一起灭亡！夏桀曾自比太阳，故百姓以“日害丧”诅咒之。时：这。害：同“曷”。何时。女：同“汝”。你。

### [ 点评 ]

本章论与民偕乐，与《梁惠王下》2.1、2.2、2.4、2.5章内容相近，放在《梁惠王下》似乎更合理。孟子不反对君主拥有一定的特权和享乐，这既是对现实的承认，也是对劳心、劳力社会分工的认可，但前提是君主要有贤的品德，能够推己及人，与民同乐，得到百姓的支持。相反，若是一味贪图个人享乐，甚至与民为敌，则只能是自取灭亡。

1.3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sup>[1]</sup>，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sup>[2]</sup>。河东凶亦然<sup>[3]</sup>。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sup>[4]</sup>，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sup>[5]</sup>。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sup>[6]</sup>。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讥惠王好战，虽有惠民之举，亦不过五十步笑百步耳。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sup>[7]</sup>，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sup>[8]</sup>，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sup>[9]</sup>。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sup>[10]</sup>，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sup>[11]</sup>。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sup>[12]</sup>，途有饿莩而不知发<sup>[13]</sup>；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sup>[14]</sup>。”

行仁政，则能  
王天下。

### [ 注释 ]

[1]寡人：古代君主、诸侯的自称。 [2]以上三句意为，河内发生灾荒，就把那里的一些百姓迁移到河东，把粮食运到河内。河内：指河南黄河以北的地区，包括今河南沁阳、济源、博爱一带，当时属魏国的领土。凶：饥荒。这里用作动词。



河东：黄河以东的地区，指今山西西南部，当时属于魏国的领土。 [3] 河东凶亦然：河东发生灾荒也是这样。即将河东的一些百姓迁移到河内，把粮食运到河东。 [4] 加少：更加少。加：更加。 [5] 以上两句意为，大王喜欢打仗，那我就用打仗来做比喻。喻：比喻。 [6] 以上三句意为，战鼓咚咚擂响，刚一交战，就丢盔弃甲，拖着兵器逃跑。填然：鼓声咚咚状。曳：拖。走：跑。 [7] 此句意为，只不过没有跑到一百步罢了。直：只不过。 [8] 此句意为，密孔的渔网不入池沼。数罟（shù gǔ）：密网。罟：网。洿（wū）池：大池。 [9] 以上两句意为，百姓养生送终没有缺憾，这是王道的开始。王道：孟子的政治主张，与霸道相对，指实行仁义以赢得民心和天下的归附。 [10] 庠（xiáng）序：古代地方所设的学校。 [11] 以上三句意为，注重学校的教育，宣讲孝悌的道理，头发花白的老人就不必在路上头顶肩扛了。颁白：须发斑白。颁：通“斑”。负戴：以背负物，以头顶物。 [12] 检：禁止。 [13] 以上两句意为，猪狗吃着人吃的粮食却不知道制止，路上有饿死的尸体却不知道开仓赈济。殍（piǎo）：同“殍”。饿死的人。发：开仓发粮；赈济。 [14] 以上两句意为，大王不要怪罪年成不好，那么天下的百姓就会投奔到你这儿来了。斯：犹“则”。

### [ 点评 ]

本章论仁政、王道。惠王认为自己治国爱民，尽心尽责。孟子认为他只是行一些小惠，并未真正尽责，特别是惠王连续对外发动战争，给魏国民众生命、财产造成巨大伤害，与那些完全不行仁政的国君没有根本区别。就好像打仗时逃跑，有的逃了一百步，有的只逃了五十

步，但本质上没有不同。故孟子以“五十步笑百步”为喻，劝其弃霸道而行王道，并对仁政、王道做了阐发：首先要尊重自然规律，“不违农时”，“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还有，给百姓足够的产业，每家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使百姓有基本的生活保障。然后，兴办学校，推行教化，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孟子的主张包含维持生态平衡，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生产，注重教化等思想，有着积极的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在孟子这里，仁政、王道的含义既密切相关又有所区别，仁政侧重于对民众的治理，王道强调对天下的平治；王道以仁政为内容，仁政以王道为归依。王道就是以仁政而非暴政赢得天下的归附，平治天下。

#### 1.4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sup>[1]</sup>。”

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sup>[2]</sup>？”

曰：“无以异也。”

“以刃与政，有以异乎<sup>[3]</sup>？”

曰：“无以异也。”

曰：“庖有肥肉<sup>[4]</sup>，厩有肥马<sup>[5]</sup>，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sup>[6]</sup>。兽相食，且人恶之<sup>[7]</sup>，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sup>[8]</sup>？仲尼曰：‘始作俑者<sup>[9]</sup>，

以政杀人，甚于以刃杀之。

其无后乎<sup>[10]</sup>！’为其象人而用之也<sup>[11]</sup>。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sup>[12]</sup>？”

### [ 注释 ]

[1] 此句意为，我愿意诚心接受指教。安：乐意。承：接受。 [2] 以上两句意为，用木棍打死人和用刀杀死人，有什么不同吗？梃（tǐng）：木棒。刃：刀刃。这里指刀。 [3] 以上两句意为，用刀杀死人和用苛政害死人，有什么不同？ [4] 庖（páo）：厨房。 [5] 厩：马棚。 [6] 率兽而食人：率领野兽吃人。率：率领。一说驱赶。朱熹《集注》：“驱兽以食人。” [7] 以上两句意为，野兽自相残食，人们尚且憎恶。且人恶之：按现在的词序，应是“人且恶之”。且：尚且。 [8] 以上三句意为，作为百姓的父母，施政却不能避免率领野兽来吃人，那么其作为百姓的父母又表现在哪里呢？恶在：何在。恶（wù）：何；怎么。 [9] 俑：古代用以殉葬的木偶或陶偶。 [10] 其无后乎：以俑代人殉葬，虽是一种进步，但俑具人形，尚有殉葬之意在。孔子崇尚仁爱，故对始作俑者亦加谴责。 [11] 象：同“像”。 [12] 以上五句意为，孔子说：“率先用人偶殉葬的，大概不会有后代吧！”因为他模仿人的样子来做殉葬品。（这样尚且不可，）又怎么能让这些百姓饥饿而死呢？斯：这些。

### [ 点评 ]

本章紧承上章，批评梁惠王以苛政杀人。孟子特别强调作为国君，应像“民之父母”一样去保民、爱民、养民，惠王不仅没有做到这一点，反而有“率兽食人”之弊。本章“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

四句，被诗圣杜甫提炼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成为批判暴政的千古名句！

1.5 梁惠王曰：“晋国<sup>[1]</sup>，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sup>[2]</sup>；西丧地于秦七百里<sup>[3]</sup>；南辱于楚<sup>[4]</sup>。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sup>[5]</sup>，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sup>[6]</sup>。王如施仁政于民<sup>[7]</sup>，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sup>[8]</sup>，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sup>[9]</sup>。

“彼夺其民时<sup>[10]</sup>，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sup>[11]</sup>，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孟子倡仁政、王道，根据皆在“仁者无敌”。

#### [ 注释 ]

[1] 晋国：韩、赵、魏三家分晋，称为“三晋”，故梁（魏）惠王亦自称魏国为晋国。 [2] 东败于齐，长子死焉：指魏惠王二十九年（前341）魏、齐马陵之战，齐威王派田忌、孙臧率军队大败魏军于马陵。魏将庞涓自杀，太子申被俘。 [3] 西丧地于秦七百里：指秦将公孙鞅打败魏国，迫使魏国割让河西郡全

部和上郡十五县，几次著名的战役分别发生在魏惠王三十年（前340）、后元五年（前330）、后元六年（前329）和后元七年（前328）。[4]南辱于楚：指魏惠王后元十二年（前323）楚、魏襄陵之战，魏军被楚将昭阳击败，被迫割让大片土地。[5]此句意为，想要为所有死者报仇雪恨。比：为；替。一：全；都。洒：同“洗”。[6]此句意为，只要有方圆百里的土地就可以称王天下。地方百里：方圆百里的土地。王(j ra-)：动词，指称王于天下。[7]仁政：孟子的思想主张，是对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主张通过一系列的惠民政策，如“制民之产”，给予充足的土地和田宅，让百姓生活有基本保障，同时轻徭薄赋、十一而税，征发徭役“无夺农时”，“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等，以赢得民心，实现政治统治。[8]以上三句意为，少用刑罚，减轻赋税，让百姓深耕细作，及时除去杂草。易耨(nòu)：即“疾耨”。及时除草。易：疾；速。[9]此句意为，可让他们制作木棒对抗秦、楚坚实的铠甲、锋利的兵刃。挞(tà)：击打。[10]此句意为，别国的统治者经常侵占百姓的生产时间。彼：指别国不行仁政的统治者。[11]此句意为，他们使百姓陷入了痛苦之中。陷溺：指陷入危难或不好的境地。

### [ 点评 ]

本章论仁者无敌。孟子到魏国时，惠王正经历了执政以来的巨大挫折，他所说的“东败于齐”“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即是魏国对外战争中几次惨痛的失败。此时的惠王复仇心切，故见到孟子就问“何以利吾国”（见1.1）。针对惠王的心理，孟子告诫其只有实行仁政，才能称王天下，因为“仁者无敌”。

需要说明的是，战国时一般只有周天子可以称王（吴、越、楚在春秋时期已称王，另当别论），诸侯一般只能称公、侯、伯等。公元前334年，梁惠王率领韩国和一些小国到徐州（今山东滕州东南）朝见齐威王，尊齐威王为王，齐威王不敢独自称王，于是也承认魏的王号，史称“徐州相王”。自此以后，诸侯纷纷称王。面对这一形势，孟子不是站在“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传统观念对其表示反对，而是因势利导，劝当时的诸侯效法当年的文王，行仁政而称王。

1.6 孟子见梁襄王<sup>[1]</sup>，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sup>[2]</sup>。卒然问曰<sup>[3]</sup>：‘天下恶乎定<sup>[4]</sup>？’

天下统一则安定。

“吾对曰：‘定于一<sup>[5]</sup>。’

“‘孰能一之？’

行仁政者可统一天下。

“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sup>[6]</sup>。’

“‘孰能与之<sup>[7]</sup>？’

仁者无敌。

“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sup>[8]</sup>。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sup>[9]</sup>，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sup>[10]</sup>。诚如是也，

民归之，由水之就下<sup>[11]</sup>，沛然谁能御之？’”

### [ 注释 ]

[1] 梁襄王：梁惠王之子，名嗣，公元前 318 年至前 296 年在位。 [2] 以上两句意为，远看不像个国君，到了他面前也不能令人敬畏。畏：敬畏。 [3] 卒：同“猝(cù)”。突然。 [4] 此句意为，天下怎样才能安定？定：安定。 [5] 此句意为，天下统一了就会安定。一：统一。 [6] 此句意为，不喜欢杀人的人能统一天下。嗜：喜好。 [7] 此句意为，谁愿归顺他呢？与：跟随；跟从。之：指“不嗜杀人者”。 [8] 以上三句意为，天上涌起大片乌云，降下大雨，禾苗便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油然：充沛的样子。沛然：盛大貌。 [9] 人牧：治理人民的人，指国君。 [10] 此句意为，那么天下的老百姓就会伸长了脖子盼望他。引：伸。颈：脖颈。 [11] 由：同“犹”。如同。

### [ 点评 ]

本章论“定于一”，是孟子王道思想的反映。公元前 319 年梁惠王去世，第二年梁襄王正式即位。孟子与他会面，此章即为二人的对话。孟子认为天下必将统一，是大势所趋。同时又认为只有“不嗜杀人者”，也就是行仁政、王道者才可以统一天下。不过，王道虽然能够赢得民心，赢得天下，但行王道还是霸道则取决于统治者自己。孟子在与襄王接触后，感到他不像个有为的君主，十分失望，不久只好离开了魏国。

1.7 齐宣王问曰<sup>[1]</sup>：“齐桓、晋文之事可得

闻乎<sup>[2]</sup>？”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sup>[3]</sup>？”

不言霸道而言王道。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sup>[4]</sup>。”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闻之胡龁曰<sup>[5]</sup>：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sup>[6]</sup>。’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sup>[7]</sup>。’对曰：‘然则废衅钟与<sup>[8]</sup>？’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sup>[9]</sup>，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sup>[10]</sup>，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sup>[11]</sup>，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sup>[12]</sup>。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sup>[13]</sup>？”

以羊易牛，可见王之仁心。

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

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王说曰<sup>[14]</sup>：“《诗》云<sup>[15]</sup>：‘他人有心，予忖度之<sup>[16]</sup>。’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sup>[17]</sup>。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sup>[18]</sup>？”

仁心何以可行王道？

### [ 注释 ]

[1] 齐宣王：战国时齐国国王田辟疆，为齐威王之子、齐湣王之父。约公元前319年至前301年在位。 [2] 齐桓、晋文之事：指齐桓公、晋文公称霸之事。齐桓：齐桓公，春秋时齐国国君，姓姜，名小白。晋文：晋文公，春秋时晋国国君，姓姬，名重耳。二人均列于春秋五霸之中。孟子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12·7）故对其事迹不屑于谈起。 [3] 以上两句意为，一定要我讲的话，那就说说称王天下吧。无以：不得已。以：同“已”。王（j ra-）：动词，见1.5注[6]。 [4] 以上两句意为，安抚百姓而称王天下，没有人能够阻挡。 [5] 胡龁（hé）：人名，齐宣

王身边的近臣。 [6] 衅钟：古代一种祭祀仪式。新钟铸成后，杀牲取血，涂在钟的缝隙处。 [7] 以上三句意为，放了牛吧！我不忍心看它战栗发抖，就像没有罪过却要处死的样子。齷齪（hú sù）：因恐惧而发抖的样子。 [8] 与：同“欤”。表疑问。 [9] 爱：吝嗇。 [10] 褊（biān）：狭小。 [11] 即：只；只是。 [12] 此句意为，大王不要责怪百姓以为您吝嗇。异：动词。奇怪；责怪。 [13] 以上四句意为，用小的羊替换大的牛，他们怎么能理解您的用心呢？如果大王可怜牛没有罪过而要处死，那么牛和羊又有什么区别呢？隐：哀痛；可怜。 [14] 说：同“悦”。 [15] 《诗》云：以下两句出自《诗·小雅·巧言》。 [16] 以上两句是说，别人有心思，我能揣摩到。忖度：推测。 [17] 以上两句意为，先生这么一说，说到我心坎上了。戚戚：心动貌。 [18] 以上两句意为，这样的心适合于称王天下，又是为什么呢？

曰：“有复于王者曰<sup>[19]</sup>：‘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sup>[20]</sup>。’则王许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sup>[21]</sup>？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sup>[22]</sup>？”

曰：“挟太山以超北海<sup>[23]</sup>，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sup>[24]</sup>，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sup>[25]</sup>。《诗》云<sup>[26]</sup>：‘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sup>[27]</sup>。’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sup>[28]</sup>。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sup>[29]</sup>。王请度之！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sup>[30]</sup>？”

推恩、扩充仁心则可行王道。

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

王笑而不言。

#### [ 注释 ]

[19] 复：回复。 [20] 以上四句意为，我的力气足以举起三千斤，却举不起一片羽毛；我的视力足以看清秋天鸟兽身上新

长的细毛，却看不见一车子柴禾。钧：古代重量单位，三十斤为一钧。秋毫：秋天鸟兽身上新长的细毛。比喻细微的事物。舆薪：一车木柴。比喻显而易见的事物。 [21] 以上三句意为，如今大王的恩惠能够施与禽兽，而功德却不能施及百姓，这到底是为为什么呢？与：同“坎”。 [22] 此句意为，不愿意做和做不到有什么区别？ [23] 太山：即泰山。北海：渤海。焦循《正义》引阎若璩《四书释地》：“齐南有太山，北有渤海……皆取齐境内之地设譬耳。” [24] 折枝：折腰；鞠躬。枝：通“肢”。见《文献通考·经籍考》引宋陆筠《翼孟音解》。一说为折取草茎树枝。喻易为之事。朱熹《集注》：“为长者折枝，以长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难也。”一说为按摩。赵岐注：“折枝，案摩。” [25] 以上三句意为，敬重自己的长辈进而敬重他人的长辈，爱护自己的孩子进而爱护他人的孩子，这样天下就可以运转在掌心之上。老吾老：尊敬我的父兄。前一个“老”为动词，指敬老、养老，后一个“老”为名词，指父兄。下“幼吾幼”句式与此相同。 [26] 《诗》云：以下三句出自《诗·大雅·思齐》。 [27] 以上三句意为，给妻子树立榜样，推广到兄弟身上，以此治理家邦。刑：同“型”。示范。寡妻：嫡妻；正妻。 [28] 此句意为，说的就是将自己的不忍人之心推广到别人身上。 [29] 以上六句意为，称一称，然后才能知道轻重；量一量，然后才能知道长短。万物都是这样，心更是如此。权：称量。 [30] 以上四句意为，难道大王要兴师动众，让将士、大臣冒着生命危险，去和别的国家结下仇怨，这样您心里才痛快吗？抑：或许；或者。

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

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sup>[31]</sup>？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

曰：“否，吾不为是也。”

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sup>[32]</sup>。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sup>[33]</sup>。”

以霸道取天下  
犹缘木求鱼。

王曰：“若是其甚与？”

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

曰：“可得闻与？”

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曰：“楚人胜。”

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sup>[34]</sup>。今王发政施仁<sup>[35]</sup>，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sup>[36]</sup>。其若是，孰能御之？”

行仁政则得民心，得民心则得天下。

## [ 注释 ]

[31] 以上五句意为，是因为肥美的食物不够吃吗？轻暖的衣服不够穿吗？还是因为艳丽的色彩不够看呢？美妙的音乐不够听呢？身边伺候的人不够使唤呢？便嬖（bì）：君主左右受宠幸的小臣。 [32] 以上四句意为，那么大王最大的愿望就可以知道了，您是想扩张疆土，使秦、楚臣服，君临中原而安抚四夷。莅（lì）：统治。 [33] 以上两句意为，以您的做法去实现您的愿望，就好比爬上树去捉鱼一样。若：人称代词，你。缘木求鱼：爬到树上去捉鱼。比喻用错误的方法不可能达到目的。 [34] 以上三句意为，用一去征服八，这同邹国对抗楚国有什么不同呢？为何不回到根本上呢？盖：通“盍（hé）”。何不。 [35] 此句意为，如果大王能发布政令，施行仁政。今：假设连词。犹“若”。 [36] 愬（sù）：诉说；告发。

王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sup>[37]</sup>。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

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sup>[38]</sup>。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sup>[39]</sup>。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sup>[40]</sup>。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sup>[41]</sup>，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sup>[42]</sup>。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

富民为先，教民次之。

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sup>[43]</sup>，奚暇治礼义哉<sup>[44]</sup>？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 [ 注释 ]

[37] 以上两句意为，我头脑昏聩，不能达到这种目标。昏：同“昏”。昏乱；糊涂。 [38] 以上两句意为，没有固定产业而有不变的志向，只有士能做到。恒产：恒常具有可以维持生计的产业。恒心：持久不变的志向，尤指向善的志向。恒：常。 [39] 以上三句意为，至于百姓，如果没有固定的产业，也就没有了不变的志向。若：至于。则：假若。 [40] 罔：同“网”。用作动词，犹言陷害。 [41] 制民之产：规定百姓的财产。 [42] 轻：轻松，容易。 [43] 赡（shàn）：足够。 [44] 以上两句意为，他们连保命恐怕都顾不上，哪还有闲暇去讲求礼义呢？奚暇：哪里顾得上。奚：何。暇：余暇；空闲。

#### [ 点评 ]

本章系统阐述仁政、王道，不仅文字较长，在思想内容上也有所深化。孟子离开魏国后，来到齐国，时齐

宣王当政。齐宣王姓田，名辟疆，为齐威王之子，公元前319年至前301年在位。孟子这次来到齐国，停留时间较长，约有六年之久，是孟子一生中较为重要的阶段。

孟子在齐国时，与宣王有多次对话，《孟子》一书就记录了十四处，本章是《孟子》中篇幅最长、也较有影响的一段文字。在该章中，孟子循循善诱，层层递进，向宣王宣讲仁政的道理，显示了高超的进谏艺术。本章内容丰富，涉及孟子政治思想的许多方面。具体包括：

一、王霸之辨。齐宣王询问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孟子直接予以回绝，认为孔门“无道桓、文之事”，表示自己更愿意宣讲王道。其实，孔门并非不谈齐桓、晋文之事，孔子本人所谈就不少，如“晋文公谄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谄”（《论语·宪问》）；“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同上）“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赐”（同上）等等，对齐桓公的霸业也是有所肯定的。孟子有意回避这一点，表明他在王霸问题上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态度。而孟子之所以尊王贱霸，是因为当时的诸侯争霸给民众的生产、生活带来深重的灾难，而在孟子心目中，只有王道才能救民众于水火。

二、推恩保民。在否定了霸道后，孟子接着向宣王宣讲王道。为了消除宣王的疑虑，他举出宣王对将被宰杀的牛有“不忍”之心的事例，说明宣王完全可以推行王道。因为所谓仁政、王道不过是将“不忍”之心推及他人，由他人推及天下，用孟子的话讲叫“推恩”，认为“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既然宣王对禽



兽都能够施以恩惠，为何却没有施及百姓呢？可见，宣王没有行仁政、称王天下，“不为也，非不能也”，是不去做，而不是做不到。因为推恩是极容易做到，而不是难以做到的事情。

三、仁者无敌。当宣王提出自己另有“大欲”时，孟子明确指出，宣王的“大欲”不过是想扩张疆土，臣服秦、楚，君临中原而安抚四夷。这实际是以己之力与天下为敌，是根本行不通的；只有实行仁政，使天下之人心悦诚服，才能称王天下。本章孟子很好地揣摩了宣王的心理，并做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因而能够因势利导，积极劝谏。至于所用的许多精妙比喻，如“力举百钧”“明察秋毫”“挟太山以超北海”“缘木求鱼”等等，早已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著名成语。

四、士民之别。孟子认为民与士不同，士是社会的特殊阶层，是“社会的良心”，是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他们以道自任，“无恒产而有恒心”，能够超越个人的私利去关注国家、民众的普遍利益。而民是一般的生产者，是社会大众，他们“无恒产，因无恒心”，若基本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便会为非作歹，无所不为。故作为士，应有精神、道义的更高要求；而对于民，首先应“制民之产”，解决百姓的物质生活，然后推行教化，“谨庠序之教”，先富而后教。

五、仁政蓝图。最后孟子描绘出一幅仁政的蓝图，这一蓝图在其他各章中也多次谈论过，其核心是保证每户有五亩宅园、百亩耕地，同时发展农副经济，保证农时，注重教育等等，这样就可以使老年人穿上丝织衣服、

吃上肉，老百姓不挨饿受冻。这一蓝图虽然反映的只是一种温饱经济，但对于身处战乱的社会底层民众来说，则无疑是其最迫切的希望，同时也成为后来无数仁人志士不断努力追求的目标。

## 梁惠王下

2.1 庄暴见孟子<sup>[1]</sup>，曰：“暴见于王<sup>[2]</sup>，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何如？”

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sup>[3]</sup>！”

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

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

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由古之乐也<sup>[4]</sup>。”

因宣王好乐，劝其推己及人以行仁政。

曰：“可得闻与？”

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sup>[5]</sup>？”

曰：“不若与人。”

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众。”

“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sup>[6]</sup>，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sup>[7]</sup>，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sup>[8]</sup>：‘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sup>[9]</sup>？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sup>[10]</sup>，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sup>[11]</sup>。”

推己及人，与民同乐，民亦乐其乐。

## [ 注释 ]

[1] 庄暴 (bào): 齐国大臣。 [2] 见于王: 被王召见。于: 表示被动, 相当于“被”。 [3] 以上两句意为, 大王非常喜爱音乐, 那么齐国差不多就可以治理好了! 其: 表推测、估计。庶几: 古代习语, 犹今语所谓“差不多”。 [4] 由: 通“犹”。好像。 [5] 以上三句意为, 独自享受快乐, 与别人一起享受快乐, 哪一种更快乐? 下面“与少乐乐”一段, 与此意同。乐乐 (yào lè): 前一乐字, 指喜好; 后一乐字, 指快乐。一说后一乐指音乐 (yuè), 亦可通。 [6] 今: 犹“若”。 [7] 管箫 (yuè): 古管乐器名。箫: 似笛而短小。 [8] 此句意为, 全都愁眉苦脸地相互议论说。举: 都。蹙頞 (cù è): 形容愁眉苦脸的样子。蹙: 紧缩。頞: 鼻梁。 [9] 极: 疲困; 穷困。 [10] 羽旄: 鸟羽和旄牛尾, 古人用作旗帜上的装饰, 故可代指旗帜。 [11] 以上两句意为, 假如大王能和百姓一同快乐, 就可以称王天下了。

## [ 点评 ]

本章的王虽然没有明说, 但应“是指齐宣王。这是由上一章和下一章所言都是齐宣王的事情而推知的”(杨伯峻《孟子译注》, 中华书局 2008 年版, 第 28 页)。故本章仍为孟子在齐国时与宣王的对话。

儒家重忠恕之道, 主张推己及人, 孟子对其做了进一步发展, 并运用到君民关系上, 作为游说诸侯行仁政、王道的方法。宣王好音乐, 孟子便通过两个设问向其表明, “独乐”不如“与人乐”“与众乐”更快乐, 一个统治者不应满足于个人的快乐, 而应该与民同乐, 做到与民同乐, 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 并最终称王天下。

本章孟子提到“今之乐由（犹）古之乐也”，需要做点说明。孔子推崇古代雅乐，反对郑国的流行音乐，主张“放郑声”，原因是“郑声淫”（见《论语·卫灵公》）；而孟子却认为流行音乐与古代雅乐差不多，与孔子的观点显然不同。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战国时代礼乐进一步崩坏，孟子所遇的君主又都好货、好色、好乐，所以孟子不好再固守孔子的乐教理想，而着眼于从启发君主“与民同乐”入手。“今之乐”与“古之乐”虽有差别，但在应“与民同乐”上则是一致的。朱熹《集注》中曾引范氏语，对此有精辟说明：“孟子切于救民，故因齐王之好乐开导其善心，深劝其与民同乐。而谓今乐犹古乐，其实今乐、古乐何可同也？但与民同乐之意，则无古今之异耳……盖孔子之言，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时之急务，所以不同。”

2.2 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sup>[1]</sup>，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sup>[2]</sup>。”

曰：“若是其大乎？”

曰：“民犹以为小也。”

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

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豢者往焉<sup>[3]</sup>，

雉兔者往焉<sup>[4]</sup>，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sup>[5]</sup>？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sup>[6]</sup>，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sup>[7]</sup>，民以为大，不亦宜乎？”

与民同之，故民以为小；不与民同之，则民以为大。

### [ 注释 ]

[1] 囿：古代畜养禽兽的园林。 [2] 传：指古代文献。朱熹《集注》：“传，谓古书。” [3] 刳菟（ráo）：割草采薪。刳：割草。菟：柴草。亦用作动词。 [4] 雉兔：用作动词，指猎取野鸡兔子。 [5] 以上三句意为，文王与百姓共同享用它，百姓认为太小，不是很自然的吗？同：共。指共享。 [6] 郊关：四郊之门，起拱卫防御作用。 [7] 此句意为，这就好像是在国内设下了一个方圆四十里的陷阱。阱：陷阱。

### [ 点评 ]

本章论推己及人，“与民同之”。孟子不反对君主可以有私人财产、物质享受，但主张君主应“与民同之”。“与民同之”是孟子民本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对于君主的一切物质财富、精神享受，孟子都用这一原则来处理。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推己及人”，靠国君的道德自觉，而国君的道德自觉则需要孟子这样士人的诱导。本章以园囿为例，说明文王与民同之，故民以为小；宣王不与民同之，则民以为大。前者是与民同之的榜样，后者则

是反面代表。

### 2.3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

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sup>[1]</sup>，文王事昆夷<sup>[2]</sup>。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sup>[3]</sup>，勾践事吴<sup>[4]</sup>。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sup>[5]</sup>；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sup>[6]</sup>。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sup>[7]</sup>：‘畏天之威，于时保之<sup>[8]</sup>。’”

乐天者保有天下而不侵人之国，畏天者服从大国而不丧其国，所可伐者仅残暴之国。

王曰：“大哉言矣<sup>[9]</sup>！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劝宣王好大勇，而非小勇。

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诗》云<sup>[10]</sup>：‘王赫斯怒<sup>[11]</sup>，爰整其旅<sup>[12]</sup>，以遏徂莒<sup>[13]</sup>，以笃周祜<sup>[14]</sup>，以对于天下<sup>[15]</sup>。’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sup>[16]</sup>：‘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sup>[17]</sup>，天下曷敢有越厥志<sup>[18]</sup>？’一人衡行于天下<sup>[19]</sup>，武王耻之<sup>[20]</sup>。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



好勇也。”

[ 注释 ]

[1] 汤：商汤，商朝的创建人。葛：葛伯，葛国的国君。葛国是商紧邻的小国，故城在今河南宁陵北十五里处。汤曾派人给葛伯送去牛羊粮食，却被葛伯杀害。其事详见本书 6.5 节。 [2] 文王：周文王。昆夷：也写作“混夷”，周朝初年的西戎国名。 [3] 太王：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周族首领。獯鬻（xūnyù）：又称豷豷（xīnyīn），当时北方的少数民族。 [4] 以上六句意为，只有仁者能以大国的身份感化小国，所以商汤曾爱护葛国，文王曾爱护混夷。只有智者能以小国的身份侍奉大国，所以周太王曾侍奉獯鬻，勾践曾侍奉吴国。勾践：春秋时越国国君。吴：指春秋时吴国国君夫差。勾践曾臣服吴王夫差。 [5] 以上两句意为，大国感化小国，这是因为喜爱天命。事：这里有感化的意思。 [6] 以上两句意为，小国服从大国，这是因为畏惧天命。事：服侍、服从之意。 [7]《诗》云：此指《诗·周颂·我将》。 [8] 以上两句意为，敬畏天的威严，因此得到保佑。时：通“是”。 [9] 此句意为，讲得太好了！大：善；好。 [10]《诗》云：此指《诗·大雅·皇矣》。 [11] 赫斯：指帝王盛怒貌。斯：语气词。 [12] 爰：语首助词。无义。 [13] 遏：止。徂（cú）：往；到。莒：殷末国名。 [14] 笃：厚。祐：福。 [15] 以上五句意为，文王勃然发怒，整顿派遣军队，狙击侵莒之敌，增加周国威福，报答天下期望。对：酬答；答谢。 [16]《书》：此乃《尚书》逸文，伪古文《尚书》放入《泰誓上》篇。 [17] 维我在：即“惟在我”。赵岐注：“四方善恶皆在己，所谓在予一人。” [18] 以上七句意为，上天降生百姓，为他们设立君主，设立师长，要他们协助上天爱护百姓。天下有罪和无罪的，都由我来负责，天下谁敢有非分之想？

厥：其。 [19] 一人：指殷纣王。横行：即“横行”。 [20] 以上两句意为，有一个人横行霸道于天下，武王就感到耻辱。指武王起兵伐纣灭殷。

### [ 点评 ]

本章论交往邻国之道，是王道政治的一个重要内容。孟子从儒家立场出发，提出仁、智的外交原则，认为仁者能够以大国感化小国；智者能够以小国服从大国。其中“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几句中的“天”含义较为抽象，大致而言，可以理解为主宰之天或者义理之天，即天是世间的最高主宰或者价值原则。天生育万物，无所不覆，无所不养，体现着仁爱的价值原则，所以真正的仁者不会恃强凌弱，以大欺小，而是“修文德以来之”，这是因为他自觉地尊奉天的意志或原则。爱护葛国的商汤、爱护混夷的文王即是其代表。同时，天高高在上，代表一种尊严与秩序，智者认识到这一点，便会以小侍大，敬畏天的意志或原则，侍奉獯鬻的周太王、侍奉吴国的勾践是其代表。喜好天命的仁者可以行王道，保有天下，而敬畏天命的智者只能保住国家。

宣王虽然认为孟子讲得好，但又提出勇，实际是想把逞强好勇作为对外邦交的原则。面对宣王的发问，孟子回答得好：大王不要喜欢匹夫之勇，而应喜好文王、武王之勇，也就是仁者之勇。用在对外邦交上，就是不要因个人的私欲恃强凌弱，而应为民众的利益诛伐不道。

2.4 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sup>[1]</sup>。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

孟子对曰：“有。人不得，则非其上矣<sup>[2]</sup>。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sup>[3]</sup>；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贤者与民同乐，民亦得其乐。若不得，则怨其上不与民同乐。

“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曰<sup>[4]</sup>：‘吾欲观于转附、朝儻，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sup>[5]</sup>？’晏子对曰：‘善哉问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sup>[6]</sup>。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sup>[7]</sup>。无非事者<sup>[8]</sup>。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sup>[9]</sup>。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sup>[10]</sup>，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sup>[11]</sup>。’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sup>[12]</sup>。睚眦胥谗<sup>[13]</sup>，民乃作慝<sup>[14]</sup>。方命虐民<sup>[15]</sup>，饮食若流<sup>[16]</sup>。流连荒亡，为诸侯忧<sup>[17]</sup>。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sup>[18]</sup>。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惟

君所行也<sup>[19]</sup>。’

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郭店竹简《鲁穆公问子思》）

“景公悦，大戒于国，出舍于郊<sup>[20]</sup>。于是始兴发补不足<sup>[21]</sup>。召大师曰<sup>[22]</sup>：‘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sup>[23]</sup>！’盖《徵招》《角招》是也<sup>[24]</sup>。其诗曰：‘畜君何尤<sup>[25]</sup>？’畜君者，好君也<sup>[26]</sup>。”

### [ 注释 ]

[1] 雪宫：齐宣王的离宫，为正宫之外临时居住的宫室。 [2] 以上两句意为，人们得不到这种快乐，就会抱怨他们的国君。非：动词。非难；埋怨。 [3] 以上两句意为，得不到就抱怨他们的国君，是不对的。非：不对；错误。 [4] 齐景公：春秋时齐国君主姜杵臼，公元前 547 年至前 490 年在位。晏子：齐国著名贤臣晏婴。 [5] 以上四句意为，我想去巡游转附、朝儻这两座山，然后沿着海边往南，一直到琅邪。我该怎么做才能和古代先王的巡游相比呢？转附、朝儻：均为山名。放：至。琅邪(yá)：山名，在今山东胶南南，面临黄海。观：游览。 [6] 以上三句意为，天子到诸侯国去叫巡狩。巡狩，就是巡视诸侯所守的疆土。 [7] 以上三句意为，诸侯去朝见天子叫述职。述职就是汇报履行职守的情况。 [8] 无非事者：无不和政事有关。 [9] 以上两句意为，春天巡视耕作情况，补助贫困；秋天巡视收获情况，救济歉收。 [10] 豫：指帝王秋天出巡。《晏子春秋·问下一》：“天子之诸侯为巡狩，诸侯之天子为述职。故春省耕而补不足者谓之游，秋省实而助不给者谓之豫。” [11] 以上六句意为，我王不巡游，我哪能得养息？我王不视察，我哪能得补助？巡游又视察，为诸侯的榜样。度：法度，亦即榜样。 [12] 以上三句意

为，现在的巡游却不是这样，队伍一出动就要筹集粮食，使得饥饿的人没饭吃，劳累的人不得休息。粮食：用作动词。指筹集粮食。 [13] 此句意为，人们侧目而视，怨声载道。睨（juàn）睨：因愤恨侧目而视的样子。胥：都。谗：毁谤。 [14] 此句意为，百姓于是被迫作恶。慝（tè）：恶。 [15] 此句意为，这种巡游违逆天命，祸害百姓。方命：违命；抗命。方：违背；违反。 [16] 饮食若流：大吃大喝如流水。 [17] 以上两句意为，这种流连荒亡，使得诸侯也担忧。 [18] 以上四句意为，从上游顺流玩到下游，乐而忘返，叫作流；从下游逆水玩到上游，乐而忘返，叫作连；打猎不知厌倦，叫作荒；喝酒不知满足，叫作亡。 [19] 惟君所行也：现在要看大王怎么做了。 [20] 以上三句意为，景公很高兴，在都城内做了充分的准备，然后搬到郊外去住。大戒：充分准备。戒：准备。舍：居住。 [21] 此句意为，于是就开仓救济穷人。兴发：开仓放粮。 [22] 大师：读为“太师”，古代乐官。 [23] 此句意为，给我作一首君臣同乐的乐曲！说：同“悦”。 [24] 《徵（zh）招》《角招》：古代乐曲名。 [25] 畜（xù）君：匡正君主的过失。朱熹《集注》：“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 [26] 以上四句意为，其中有句歌词说：“匡正君主的过失有什么不对呢？”匡正君主的过失，正是爱护君主啊。

### [ 点评 ]

本章论推己及人、“与民同乐”。宣王问贤者亦可以有雪宫之乐？其所说的“乐”指个人的享乐，实际是君主的特权。而孟子则从“与民同乐”来理解“乐”，强调君主的责任和义务是与民同乐，认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

天下”。故真正的快乐是与民同乐，是君主、百姓皆得到、实现其快乐。后北宋政治家、儒家学者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无疑受到孟子的启迪，是对孟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真正的“贤者之乐”。

本章后面一段举出齐景公与晏婴的故事，进一步表达了孟子反对暴政、关心民众疾苦的仁政思想。

2.5 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sup>[1]</sup>，毁诸？已乎？”

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sup>[2]</sup>，则勿毁之矣。”

王曰：“王政可得闻与？”

文王之行仁政。

对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sup>[3]</sup>，耕者九一，仕者世禄<sup>[4]</sup>，关市讥而不征<sup>[5]</sup>，泽梁无禁<sup>[6]</sup>，罪人不孥<sup>[7]</sup>。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sup>[8]</sup>。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sup>[9]</sup>：‘哿矣富人<sup>[10]</sup>，哀此羸独<sup>[11]</sup>！’”

王曰：“善哉言乎！”

## [ 注释 ]

[1] 明堂：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都在此举行。赵岐注：“谓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东巡狩朝诸侯之处也，齐侵地而得有之。人劝齐宣王，诸侯不用明堂，可毁坏，故疑而问于孟子当毁之乎。”按赵说，这里是指泰山明堂，是周天子东巡时所设。 [2] 王政：王道之政，犹王道、仁政。 [3] 岐：地名，在今陕西岐山东北。相传周太王古公亶父自豳（b n，陕西旬邑）迁此建邑，成为周族居住之处。 [4] 以上两句意为，耕田者交纳九分之一的税，出仕者世代承袭俸禄。 [5] 关市讥而不征：关卡和市场只稽查不征税。讥：稽查。 [6] 此句意为，不禁止在湖泊中捕捞。泽梁：在水流中用石筑成的拦水捕鱼的堰。《荀子·王制》：“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杨倞注：“石绝水为梁，所以取鱼也。” [7] 孥（nú）：妻子儿女。这里用作动词。不孥，即不牵连妻子儿女。 [8] 以上两句意为，这四种人，是天下贫穷百姓中没有依靠的。告：诉说，引申为依靠。 [9] 《诗》云：以下两句出自《诗·小雅·正月》。 [10] 哿（g）：同“可”。 [11] 以上两句意为，富人的生活过得去，最可怜的是孤独无依靠的人。菑（dǎ-）独：指孤独无依靠之人。

曰：“王如善之，则何为不行？”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sup>[12]</sup>。”

对曰：“昔者公刘好货<sup>[13]</sup>，《诗》云<sup>[14]</sup>：‘乃积乃仓，乃裹糗粮<sup>[15]</sup>，于橐于囊<sup>[16]</sup>，思戢用光<sup>[17]</sup>。弓矢斯张，干戈戚扬<sup>[18]</sup>，爰方启行<sup>[19]</sup>。’

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囊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sup>[20]</sup>？”

推好货之心，与百姓共之，则可称王天下。

[ 注释 ]

[12] 以上两句意为，我有个毛病，我喜欢钱财。货：财物。 [13] 公刘：周族早期首领，曾率部落从邠迁至豳，周族从此兴旺起来。 [14] 《诗》云：以下七句引自《诗·大雅·公刘》。 [15] 裹：包扎；缠绕。糒(hóu)粮：干粮。 [16] 橐、囊：盛东西的口袋。 [17] 思：语气词，无义。戢：同“辑”，和睦。用：因而。光：发扬光大。 [18] 干戈戚扬：四种兵器。干：盾牌。一说刺人之兵器。戈：古代主要兵器，有突出的援，援上下皆刃，用以横击和钩杀。戚：斧一类兵器。扬：钺，大斧。 [19] 以上七句意为，粮食积满仓，准备好干粮，装进小袋和大囊，和睦团结争荣光。箭上弦、弓开张，干戈斧钺拿手上，于是启程奔前方。爰：于是；就。方：开始。启行：出发。 [20] 以上三句意为，大王如果喜欢钱财，使百姓也能有钱财，那么称王天下有什么困难呢？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对曰：“昔者太王好色，爰厥妃。《诗》云<sup>[21]</sup>：‘古公亶父<sup>[22]</sup>，来朝走马<sup>[23]</sup>，率西水浒<sup>[24]</sup>，至于岐下，爰及姜女<sup>[25]</sup>，聿来胥宇<sup>[26]</sup>。’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推好色之心，与百姓共之，则可称王天下。



## [ 注释 ]

[21]《诗》云：以下六句引自《诗·大雅·绵》。 [22]古公亶（d n）父：即周文王的祖父周太王。 [23]来朝：第二天早上。 [24]率：循。泚：水边。 [25]爰：语首词，无义。姜女：太王的妃子。也称太姜。 [26]以上六句意为，太王古公亶父，清晨骑马奔驰，沿着西边水滨，来到岐山脚下，带着宠妃姜氏女，视察居处好安家。聿：语首词，无义。胥：省视，视察。宇：屋宇。

## [ 点评 ]

本章详论仁政的内容及推己及人行仁政的方法。孟子以文王治岐为例，说明仁政的具体内容，包括“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等等。当宣王以自己“好货”“好色”推脱时，孟子则用公刘好货、古公亶父好色的事例，说明关键要“与民同之”。若能像先王那样，扩充好货之心，让百姓居有余粮，过上富足的日子；扩充好色之心，让男女成家立业，过上美满的生活，一样可以称王天下。在《梁惠王上》1.7中，孟子曾以宣王对牛“不忍其觶觫”“见其生，不忍见其死”为例，劝说宣王“推恩”，“保民而王”。其所推主要是“不忍”之心，也就是恻隐之心，本章所推则是“好货”“好色”之心。故在孟子这里，实际存在两种“推”，一种是推己之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是道德情感的扩充、推广，用孟子的话说是“推恩”；一种是推己之好货、好色之心，实际是将心比心，承认他人生理欲望的合理性，强调“与民同之”。两种“推”有所不同，但又存在着联系。其中前一种“推”是后一种“推”的

前提或根据，只有“推恩”才有可能做到“与民同之”；后一种“推”则是前一种“推”的落实和实现，“推恩”需体现为对民众物质及婚姻生活的关注。两种“推”都发生在国君与民众之间，是自上而下的关爱和施与，也就是孟子所讲的“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7.9），是儒家忠恕之道的重要内容。

本章开头提到的“明堂”，即“明政教之堂”，是古代帝王宣明政治教化的地方。举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都在此举行。在中国古代政治及文化运作中，明堂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多有关于明堂的记载，如《周礼·冬官考工记》中有关于明堂形制的描述，《小戴礼记》中有《明堂位》一篇，《大戴礼记》中也有《明堂》篇，专门记述明堂的建筑规格，以及政教活动的内容。宣王提到的明堂，据说是周初武王东征时所建，位于当时属于齐国境内的泰山脚下。战国中期，各大诸侯国虽然不再打出尊周的口号，但还没有谁明目张胆地提出灭周的主张。当时的齐宣王一心称霸中国，征服天下，存有取代周天子的野心，便借口别人建议他拆毁明堂，来试探孟子。对于宣王的发问，孟子避开尊周与否的问题，只强调明堂是推行王道之堂，象征着王道理想，如要实行仁政，就不应拆毁明堂，把话题引到了仁政、王道上。说明孟子并不固守原有的政治制度和尊卑秩序，而是更重视统治者行仁政、王道，认为行仁政、王道，比遵守原有的政治制度和尊卑秩序更重要。

2.6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sup>[1]</sup>，比其反也<sup>[2]</sup>，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sup>[3]</sup>？”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sup>[4]</sup>，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sup>[5]</sup>。”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

理屈词穷，知己亦当罢免。

#### [ 注释 ]

[1] 妻子：妻子和儿女。之：往；到……去。 [2] 比：及；至。反：同“返”。 [3] 以上四句意为，如果大王有一个臣子把妻儿托付给朋友照顾，自己到楚国去游玩，等他回来时，发现自己的妻儿却在受冻挨饿，那该怎么办呢？ [4] 此句意为，士师管不好他的下属。士师：司法官。 [5] 已：罢免。

#### [ 点评 ]

本章论君之职责，是孟子民本思想的重要内容。孟子通过三个设问，环环紧扣，层层递进，最后一问，迫使“王顾左右而言他”。寥寥数字，微妙传神，生动地勾画出宣王尴尬难堪、理屈词穷的窘态。其背后的潜台词是，君主不过是受上天之托的管理者，他只具有对天下的管理权，而不具有所有权，如不称职，同样可以易位。

2.7 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sup>[1]</sup>。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sup>[2]</sup>。”

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sup>[3]</sup>？”

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sup>[4]</sup>？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民意为上。

#### [ 注释 ]

[1] 以上三句意为：所谓历史悠久的国家，不是说国中要有高大的树木，而是说要有世代建立功勋的大臣。 [2] 以上三句意为，大王现在没有亲信的臣子，过去任用的人，都不知哪里去了。进：进用。 [3] 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我怎样才能识别无能之人而不任用他们呢？ [4] 以上五句意为，国君进用贤才，如果不得已，将会使卑者超越尊者，疏者超越亲者，能不慎重吗？

## [ 点评 ]

本章论述选用贤才和罢免不才，强调了民众意见的重要性。本章的观点，应是受到孔子“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的影响，但孟子突出了民的地位，强调民意在决策中的重要性，将其作为官吏任免的重要依据，是对民本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

本章提到“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并不意味着孟子反对尚贤。相反，《孟子》一书中多次谈到尚贤，主张“尊贤使能，俊杰在位”（3.5），要求“立贤无方”（8.20）。孟子这样讲，可能是因为“卑逾尊，疏逾戚”在当时还是一件大事，故要求执政者谨慎处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矛盾。

2.8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sup>[1]</sup>，武王伐纣<sup>[2]</sup>，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sup>[3]</sup>。”

《周易·革·象辞》：“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 [ 注释 ]

[1] 汤放桀：汤：商朝的开国之君。桀：夏朝最后一个君主。放：流放。传说商汤灭夏后，把桀流放到南巢（据传在今安徽巢县一带）。 [2] 武王伐纣：纣，商朝最后一个君主，昏乱残暴。

周武王起兵讨伐，灭掉商朝，纣自焚而死。 [3] 以上五句意为，残害仁的人叫作贼，残害义的人叫作残，残贼之人叫作独夫。我只听说诛杀了独夫纣，没听说杀害国君。

### [ 点评 ]

本章论汤武革命。孟子虽承认君的统治地位，但并不把君看作是最高的，君之上还有天，而天又是民意的代表，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故君主不过是上天推选的管理者（参见 9.5 点评），只有行仁政，保民、爱民，其统治才具有合法性；若残仁害义，便成为人可诛之的独夫民贼。正是基于这一点，孟子肯定了汤武革命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诚如学者所言：“人君上面的神，人君所凭藉的国，以及人君的本身，在中国思想正统的儒家看来，都是为民的存在……可以说神、国、君，都是政治中的虚位，而民才是实体。”“即使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不仅那些残民以逞的暴君污吏没有政治上的主体地位，而那些不能‘以一人养天下’，而要‘以天下养一人’的为统治而统治的统治者，中国正统的思想亦皆不承认其政治上的地位。”（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台湾学生书局 1985 年版，第 51—52 页）“孟子之政治思想，遂成为针对虐政之永久抗议。”“专制时代忠君不二之论，诚非孟子所能许可。”（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 1 册，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7—88 页）

2.9 孟子谓齐宣王曰：“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sup>[1]</sup>。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斫而小之<sup>[2]</sup>，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sup>[3]</sup>？今有璞玉于此<sup>[4]</sup>，虽万镒<sup>[5]</sup>，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

范祖禹：“古之贤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学；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贤者不能从其所好。”（朱熹《集注》引）

#### [ 注释 ]

[1] 工师：管理各种工匠的官员。 [2] 此句意为，木匠把木料砍小了。斫（zhuó）：砍削。 [3] 以上四句意为，人从小学会一种本领，长大了就要运用，大王却说：“姑且丢掉你所学的来听我的。”这样行吗？ [4] 璞玉：未经雕琢加工过的玉。 [5] 镒（yì）：古代重量单位，二十两（一说二十四两）为一镒。

#### [ 点评 ]

本章为孟子向齐宣王的进谏之言，强调治国当尊重贤者之言。孟子到齐国后，对宣王循循善诱，不断宣讲“王道”“仁政”，但宣王不仅充耳不闻，不为所动，反而要求孟子放弃主张，听命于自己。故孟子用两个比喻说明：治国与造房、治玉一样，都需要专业的知识与技能。宣王要求别人听命于自己，正如教导玉匠如何雕琢玉石

一样可笑。

苏格拉底曾提出，如果我们想使一个人成为鞋匠，就要送他去见鞋匠；要成为医生，就要送他去医生那里，其他行业也是一样。（参见《美诺篇》，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23页）因此在他看来，“如果做鞋或评判鞋的好坏要请教具有专门知识的鞋匠，为什么治理国家和评判政治的好坏却不去请教具有专门政治知识的人，而去请教只具有制鞋、做马具等手艺的人，甚至并无任何专门知识可言的人呢？”苏格拉底与孟子都强调治国需要专业的知识与技能，但具体语境又有所不同。孟子针对的是世袭制下的国君，苏氏针对的则是直接民主制下的大众。

2.10 齐人伐燕<sup>[1]</sup>，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sup>[2]</sup>，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取与不取，以燕民意见为准。

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sup>[3]</sup>。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sup>[4]</sup>，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sup>[5]</sup>。”



## [ 注释 ]

[1] 齐人伐燕：公元前 315 年（齐宣王五年），燕王哙将燕国让给相子之，将军市被和太子平不服而作乱，子之反攻，杀死了市被和太子平，国内一片混乱。齐宣王趁机进攻燕国，取得了胜利。 [2] 取：占领；吞并。指将燕国的土地据为己有。 [3] 以上两句意为，古人有这么做的，那就是周文王。指周文王在三分天下有其二时，仍然服侍商纣王。 [4] 箪食壶浆：用箪装着食物，用壶装着酒浆。箪：古代用来装饭食的盛器，以竹或苇编成，圆形，有盖。 [5] 以上三句意为，如果使水更深、火更热，燕国的百姓就要转而盼望别人来拯救了。运：转而求助之意。

## [ 点评 ]

本章及下一章为孟子与齐宣王围绕伐燕的对话，反映了孟子的民本与王道思想。齐宣王五年（前 315），齐国的近邻燕国发生了一件大事。燕王哙受当时广泛流行的禅让思想的影响，接受谋臣鹿毛寿等人的建议，让国于相子之，结果引起燕国的一场内乱。齐国趁机出兵，几乎没有遇到抵抗便大获全胜。于是宣王请教孟子，是否要趁机吞并燕国。孟子从民本的立场出发，认为如果燕国百姓欢迎，便吞并；如果燕国百姓不欢迎，便不吞并。可见，即使在对外战争中，孟子也是将民意作为重要根据，充分体现了他的民本思想。

2.11 齐人伐燕，取之。诸侯将谋救燕。宣王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

孟子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sup>[1]</sup>。《书》曰：‘汤一征，自葛始<sup>[2]</sup>。’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sup>[3]</sup>？’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sup>[4]</sup>，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sup>[5]</sup>，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苏<sup>[6]</sup>。’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sup>[7]</sup>，毁其宗庙，迁其重器<sup>[8]</sup>，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sup>[9]</sup>。王速出令，反其旄倪<sup>[10]</sup>，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sup>[11]</sup>。”

犹以燕伐燕，  
非仁者所为。

### [ 注释 ]

[1] 此句意为，没有听说凭着方圆千里的土地还怕别人的。 [2] 以上三句意为，《尚书》中说：“商汤初次征伐，是从葛国开始的。”《书》：《尚书》，孟子所引为《尚书》逸篇。一征：初征；始征。《滕文公下》6.5作“汤始征，自葛载”。 [3] 此句意为，为什么不先来解救我，而把我放在后面呢？奚：为何；为什么。后我：把我放在后。 [4] 归市：趋向集市。指赶集。 [5] 以上

三句意为，赶集的照常赶集，种地的照常种地。杀了那里的暴君，慰问那里的百姓。吊：慰问。 [6] 以上两句意为，等待我们的君王，君王来了获新生。徯(x)：等待。后：王；君主。苏：恢复；复活。 [7] 系累：束缚；捆绑。 [8] 重器：古代君王所铸造的作为传国宝器的鼎之类。迁其重器，意味着灭亡其国家。 [9] 以上三句意为，天下本来就害怕齐国的强大，如今齐国土地扩大一倍却不施行仁政，这是挑动各国出兵啊。 [10] 旄倪(máo ní)：老人与儿童。旄：同“耄”，古时八十至九十岁称耄，这里泛指老人。倪：儿童。 [11] 以上六句意为，大王赶快发布命令，放回他们的老人孩子，停止搬运他们的宝器，同燕国人商量，选立一位国君然后撤兵，这样还来得及阻止各国出兵。止：指阻止各国出兵。

### [ 点评 ]

宣王出兵占领燕国后，不是安民、抚民、保民，相反是烧杀掳掠，甚至毁坏其宗庙，结果不但没有赢得燕人的拥护，相反引起激烈反抗。加之诸侯联合出兵讨伐齐国，于是宣王再次向孟子询问对策。孟子以商汤为例，说明只有仁义之师，才能救民于水火，得到百姓的拥护。建议宣王下令停止掠夺，释放无辜，与燕国百姓一起选立一位君主然后撤兵，以阻止各国出兵。可惜宣王没有听进孟子的进言，最终导致“燕人畔(叛)”(4.9)。本篇关于孟子在齐国的活动至此章暂时结束，相关的内容将在《公孙丑下》出现。

2.12 邹与鲁鬪<sup>[1]</sup>。穆公问曰<sup>[2]</sup>：“吾有司

死者三十三人<sup>[3]</sup>，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sup>[4]</sup>，如之何则可也？”

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sup>[5]</sup>，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sup>[6]</sup>，而君之仓廩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sup>[7]</sup>。曾子曰<sup>[8]</sup>：‘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sup>[9]</sup>。’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sup>[10]</sup>。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sup>[11]</sup>，死其长矣。”

朱熹：“君行仁政，则有司皆爱其民，而民亦爱之矣。”（《集注》）

### [ 注释 ]

[1] 邹：古国名，其地在今山东邹城附近，为孟子的母国。鬲（hòng）：争斗。 [2] 穆公：指邹穆公。 [3] 有司：官吏。 [4] 以上两句意为，不杀这些百姓吧，又恨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长官被打死而不去相救。疾：憎恨。 [5] 转：弃尸。 [6] 几：将近；几乎。 [7] 此句意为，这是官员怠慢渎职而残害老百姓啊。上：指在上位者。慢：怠慢。 [8] 曾子：孔子弟子曾参，字子舆。 [9] 以上三句意为，警惕啊，警惕啊！从你身上出去的，还会回到你身上。 [10] 尤：动词。责备；归罪。 [11] 斯：则。

### [ 点评 ]

本章论仁政，是孟子早期活动的记载。孟子是邹人，其游说诸侯当是从邹穆公开始的。周广业《孟子四考》说：

“孟子之仕，自邹始也。时方隐居乐道，……会与鲁阨，有司多死者，公问如何而可？孟子以仁政勉之。”据本章，邹国与鲁国发生争斗，邹国的长官被打死三十多人，而邹国的百姓却在一旁见死不救。邹穆公便向孟子请教，该如何处置这些人。站在今天的角度，孟子实际是遇到了“人民为何不爱国”的问题。孟子认为不能以官吏甚至君主代表国家，国家的主体是民众，而非君主、官吏，后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4.14），即是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思考。百姓的冷漠，责任在官吏。邹国的官吏平时缺乏仁爱之心，对百姓的死活不闻不问，现在算是得到了报应。解决民众的“爱国”问题要靠“行仁政”，执政者只有执政为民，造福于民，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孟子这里虽提到仁政，但对如何实行仁政却没有说明，其思想还在形成之中。

关于本章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孟子四十岁左右。如谭贞默《孟子编年略》说：“孟子四十以前，讲学设教；六十以后，归老著书。其传食诸侯当在四十以外。”

2.13 滕文公问曰<sup>[1]</sup>：“滕，小国也，间于齐、楚<sup>[2]</sup>。事齐乎？事楚乎？”

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能及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sup>[3]</sup>，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sup>[4]</sup>，则是可为也<sup>[5]</sup>。”

得民心为本，  
事大国为末。

## [ 注释 ]

[1] 滕文公：战国时滕国国君。滕国为西周分封的诸侯国，姬姓，在今山东滕州西南。 [2] 间：处于……之间。 [3] 斯：代词。这。池：护城河。 [4] 效死：献出生命至于死。指卖力而不顾生命。 [5] 以上八句意为，这样的谋略不是我能想出来的。一定要我说，就只有一个办法：深挖护城河，筑牢城墙，与百姓一起来守卫，献出生命百姓也不离去，这样就可以有所为了。

## [ 点评 ]

本章及下面两章记载孟子在滕国的活动。孟子一生游说诸侯，所遇只有滕文公一位知音。早在孟子在宋国时，尚未即位的滕文公便两次拜访孟子，被孟子的学说深深打动（见 5.1）；正式即位后，便派人将孟子接到滕国（见 5.2、5.3、5.4）。孟子到滕国后，积极推行仁政，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也遇到一定挑战，本章及以下两章记录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孟子虽得到滕文公的信任，无奈滕国是一个小国，夹在齐、楚两个大国之间，面临着到底侍奉齐，还是侍奉楚的问题。孟子反对在外交上左右逢源，主张加强战备，争取民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誓与国家共存亡。

2.14 滕文公问曰：“齐人将筑薛<sup>[1]</sup>，吾甚恐，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sup>[2]</sup>。苟

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sup>[3]</sup>。君子创业垂统，  
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sup>[4]</sup>。君如彼何哉？  
强为善而已矣<sup>[5]</sup>。”

尽人事以待天  
命。

### [ 注释 ]

[1] 薛：古国名，其地在今山东滕州东南，战国初期为齐所灭，成为齐权臣田婴、田文的封邑。 [2] 以上四句意为，离开邠，到岐山下居住。这不是主动的选择，而是迫不得已。邠(b n)：古地名，在今陕西郴县。 [3] 以上两句意为，如果能推行善政，后代子孙中必定会有称王天下的。 [4] 以上四句意为，君子创立基业传之后世，是为了可以世代相继。至于能否成功，那只能由天来决定。天：指命运天。 [5] 以上两句意为，您如何对待齐国呢？只有努力推行善政罢了。

### [ 点评 ]

本章承上章，继续论“强为善”。薛本是周初一个任姓的小国，后被齐国灭掉了，成为齐靖郭君田婴的封地。薛离滕国很近，齐人在薛地修筑城池，自然威胁到滕国，所以滕文公很担心，向孟子求教。但在“当今争于力气”的时代，除了主张“强为善”，努力实行仁政，自立自强外，孟子也提不出其他办法，至于能否成功，也只能看天意了。

据记载，田婴于公元前322年（梁惠王后元十三年，齐威王三十五年）四月封于薛，十月在薛地筑城，故孟子答滕文公问，应在该年四月之后、十月之前。

2.15 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竭力以事大国，则不得免焉，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sup>[1]</sup>，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sup>[2]</sup>：‘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sup>[3]</sup>。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邠，逾梁山<sup>[4]</sup>，邑于岐山之下居焉<sup>[5]</sup>。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为也，效死勿去<sup>[6]</sup>。’君请择于斯二者。”

小不敌大，则  
或去国，或坚守。

### [ 注释 ]

[1]皮币：毛皮和缙帛。古代用作聘享的贵重礼物。 [2]属(zh)：聚集；会合。耆(qí)老：老年人。《礼记·曲礼上》：“六十曰耆。” [3]此句意为，君子不用养人的东西（指土地）害人。 [4]梁山：山名，在今陕西乾县西北五里。 [5]邑：用作动词，建筑城邑。 [6]以上四句意为，也有人说：“世代相守的地方，自己不可以擅自处理，就是死也不能离开。”

### [ 点评 ]

本章与前面两章问题相同，均是讨论滕国在大国威



胁下如何自保的问题。孟子提出两条措施：或者迁国图存，或者坚守国土。在这种情况下，孟子感到难以借滕国实现仁政理想，于是不久离开了滕国。

以上三章均为孟子在滕国后期事，似归入《滕文公》篇更为合理，放在本篇或是为说明孟子推行仁政的困境和艰难，或是表达孟子坚守仁义的信念。

2.16 鲁平公将出<sup>[1]</sup>，嬖人臧仓者请曰<sup>[2]</sup>：“他日君出，则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舆已驾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请<sup>[3]</sup>。”

公曰：“将见孟子。”

曰：“何哉，君所为轻身以先于匹夫者<sup>[4]</sup>？以为贤乎？礼义由贤者出，而孟子之后丧逾前丧<sup>[5]</sup>。君无见焉！”

公曰：“诺。”

乐正子入见<sup>[6]</sup>，曰：“君奚为不见孟轲也？”

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后丧逾前丧。’是以不往见也。”

曰：“何哉，君所谓逾者？前以士，后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后以五鼎与<sup>[7]</sup>？”

曰：“否，谓棺槨衣衾之美也<sup>[8]</sup>。”

曰：“非所谓逾也，贫富不同也<sup>[9]</sup>。”

乐正子见孟子，曰：“克告于君，君为来见也。嬖人有臧仓者沮君<sup>[10]</sup>，君是以不果来也。”

鲁侯来与不来，在己不在人。吾遇昏聩之鲁侯，天意也；故吾之不得见，亦天也。

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sup>[11]</sup>。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sup>[12]</sup>？”

#### [ 注释 ]

[1] 鲁平公：战国时鲁国国君姬叔，公元前322年至前303年在位。 [2] 嬖（bì）人：受宠幸而地位卑下的人。 [3] 以上五句意为，以前您外出，一定会告诉管事的人要去的地方。现在车马已经准备好了，管事的人还不知道您要去哪里，所以冒昧来请示。敢请：冒昧请问。敢：谦辞，冒昧之意。 [4] 以上两句意为，您不顾及自己的身份而去问候一个普通人，这是为什么呢？所为：所以。为：以。先：通“洗（shǎn）”。问候。 [5] 后丧逾前丧：母亲的丧事超过了父亲的丧事。孟子父亲先卒，故后丧指母丧，前丧指父丧。 [6] 乐正子：孟子弟子乐正克，当时在鲁国做官。 [7] 以上六句意为，您所说的超过，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先用士礼，后来用大夫之礼吗？先前用三个鼎，后来用五个鼎吗？ [8] 此句意为，是指棺槨衣物的华美。棺槨：棺和槨。古代士以上的人常用两重以上的棺木，内曰棺，外曰槨。衣衾（qīn）：死者入殓时所用的衣服被褥。 [9] 以上两句意为，这不叫超过，只是前（孟子父亲去世时）后（孟子母亲去世时）贫富不同罢了。 [10] 沮（jǔ）：阻止。 [11] 以上四句意为，平公来，是某种非人力所能决定的命在促使；不来，也是这种命在阻止。或认

为是说，道行进，是有某种力量在推动它；道停止，是有某种力量在阻止。尼（nì）：阻拦。 [12] 以上五句意为：（平公）来与不来，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我不能与鲁君相见，这是天意。姓臧的小子怎能阻止我与鲁君相见呢？

### [ 点评 ]

儒家重视命，孔子自称“四十而知命”，认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郭店竹简《穷达以时》说：“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有其人，无其世，虽贤弗行矣。苟有其世，何难之有哉？”其所说的天指命运天，所谓“遇不遇，天也”，故也是对命运问题的讨论。根据《穷达以时》此说，关系世间人们命运的，不仅有个人的努力，也有天的影响，天人各有其分。分是职分的意思。天人之分是说天人各有其职分、作用、范围，二者互不相同。而明白了哪些属于人，哪些属于天，便知道哪些该为，哪些不该为，知道应该如何行为了。郭店竹简《语丛一》：“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道，知道然后知命。”这里的“天所为”“人所为”就是其职分和作用，也就是天人之分。在《语丛》看来，个人的富贵穷达主要取决于时运，这些属于天，是天的职分；而一个人的德行如何则主要靠自己，属于人的职分。明白了这种“天人之分”，就不应汲汲于现实的际遇，而应“敦于反己”，只关心属于自己职分的德行，“尽人事以待天命”，这样就做到了“知命”。后孟子在孔子的知命、《穷达以时》的天人之分的基础上提出了“性命之分”，认为仁义礼智根于心、内在于性，由于

人具有意志自由，“求则得之，舍则失之”，能否得到取决于自己，与命运无关，所以是“在我者也”；而感官需要以及希望富贵显达等虽然也出于性，但“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能否实现取决于命，所以只能看作是“在外者也”。确立了这种天人或性命之分，就不应为外在的际遇所左右，而孜孜于我性分内的仁义礼智，“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孟子本章及其他各章有关命运的讨论（见13.1、13.2、13.3、13.21、14.24），都可以从“天人之分”或“性命之分”的思想去理解（参见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第八章第二节《竹简〈穷达以时〉与早期儒家天人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47—467页）。

本章记孟子欲见鲁平公受阻事，反映其天命观及不怨天尤人的处事原则。孟子在齐国时，母亲去世，孟子从齐国回到鲁国办理丧事。这时孟子在诸侯间有了一定声望，弟子乐正克也在鲁国为官，故鲁平公想前来拜访。不料平公身边的宠臣臧仓从中作梗，致使平公最终未能成行。对于这一变故，孟子持一种达观的态度，认为自己不得与平公相见，乃是冥冥之中天在起作用，并非小人臧仓可以阻止的。孟子所说的天，既非上古有意志、有目的的神学天，也不同于后来“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自然天，而是一种命运天，它既可以指某种社会的“合力”或“势”，也可以指出人意的某种机遇或巧合等等。这种天作为一种神秘的力量，作用到我们每个人，或者说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种天的影响之下。具体到孟子不遇平公，表面上看似乎是臧仓的破坏，但平公来与不

来，不是别人能决定的，关键还在平公自己。平公不辨别是非，轻信谗言，自身就存在很大问题。而遇到平公这样的君主，只能说是天意。明白了这一点，就不必为一时的挫折怨天尤人，而应该尽人事以待天命，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之。所以，孟子虽然提出天，但并不是取消人的主动性，让人听天由命。相反，他是通过明“天人之分”（参见14.24点评），化解人生际遇的种种困惑，以获得心理的舒坦与安定，凸显人之为人的价值与尊严。

孟子葬母的记载又见《公孙丑下》4.7：“孟子自齐葬于鲁，反于齐，止于嬴。”可知孟子是从齐国回到鲁国丧葬母亲，至于时间，据学者考证，应是孟子第二次来齐国的齐宣王时期。

## 公孙丑上

3.1 公孙丑问曰<sup>[1]</sup>：“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sup>[2]</sup>？”

朱熹：“齐人但知其国有二子而已，不复知有圣贤之事。”（《集注》）

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sup>[3]</sup>：‘吾子与子路孰贤<sup>[4]</sup>？’曾西蹙然曰<sup>[5]</sup>：‘吾先子之所畏也<sup>[6]</sup>。’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赧然不悦<sup>[7]</sup>，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sup>[8]</sup>？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sup>[9]</sup>。尔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sup>[10]</sup>？”

管仲得齐国之大，得其君信任之专，而不能称王天下，是以不足法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sup>[11]</sup>，晏子以其君显。管

仲、晏子犹不足为与？”

曰：“以齐王，由反手也<sup>[12]</sup>。”

曰：“若是，则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sup>[13]</sup>。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sup>[14]</sup>？”

#### [ 注释 ]

[1] 公孙丑：孟子弟子，齐国人。 [2] 以上两句意为，如果先生在齐国当政，管仲、晏子的功业能够再度实现吗？当路：当权；当政。管仲：名夷吾，字仲，齐桓公之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许：兴起。赵岐注：“犹兴也。” [3] 曾西：名申，字子西，曾参之子。 [4] 吾子：对友人的昵称，相当于“吾兄”“老兄”。子路：孔子弟子仲由，字子路。 [5] 蹙（cù）然：不安的样子。 [6] 先子：已去世的长辈。这里指曾西的父亲曾参。畏：敬。 [7] 黜（bó）然：恼怒的样子。 [8] 此句意为，你为何竟拿管仲与我相比？何曾：为何竟然。曾：竟然；居然。 [9] 以上三句意为，管仲得到君主的信任是那样专一，执掌国政是那样长久，而功业却是那么微不足道。 [10] 以上三句意为，管仲，是连曾西都不愿效法的，你以为我会愿意吗？为：同“谓”。认为。 [11] 此句意为，管仲使他的君主称霸天下。以：使。 [12] 以上两句意为，以齐国的实力而称王天下，易如反掌。由：同“犹”。好像。 [13] 以上五句意为，以文王的仁德，活了近百岁才去世，尚且没有做到使天下和洽。武王、周公继承他的事业，然后才使德政广泛推行。周公：姓姬，名旦，周

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因采邑在周（今陕西岐山北），称为周公。曾辅佐武王伐纣灭商，统一天下；后又辅佐成王，巩固了周初的统治。 [14] 以上两句意为，现在您把称王天下说得这样容易，那么文王也不值得效法了吗？若易然：这样容易。若：如此；这样。易：容易。然：助词。

曰：“文王何可当也<sup>[15]</sup>。由汤至于武丁<sup>[16]</sup>，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sup>[17]</sup>，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sup>[18]</sup>，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sup>[19]</sup>。

文王虽形势不利，仍百里之地行仁政而称王天下，是其可法也。

“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sup>[20]</sup>。’今时则易然也<sup>[21]</sup>。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sup>[22]</sup>。地不改辟矣<sup>[23]</sup>，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sup>[24]</sup>。饥者



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sup>[25]</sup>。’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当今之时，最宜于行仁政称王天下。

### [ 注释 ]

[15] 文王何可当也：怎么能和文王相比。 [16] 武丁：商代帝王，后被称为高宗。 [17] 微子：商纣王的庶兄，名启。微仲：微启的弟弟。王子比干：纣王叔父，因多次劝谏，被纣王剖心而死。箕(j)子：纣王叔父。胶鬲(-u)：纣王之臣。 [18] 相与：共同。辅相(kra-)：辅助。 [19] 以上六句意为，当时，没有一尺土地不属于纣王所有，没有一个百姓不归纣王统治，然而文王却从方圆百里的地方兴起，所以是很困难的。 [20] 以上四句意为，虽然有智慧，不如趁形势；虽然有锄头，不如等农时。铍(z)基：今写作铍镬。锄头。 [21] 今时则易然也：现在的时势就很容易做到这样了（指称王天下）。 [22] 以上六句意为，夏、商、周三代兴盛时，没有哪个国家的土地超过方圆千里，而齐国却有那么辽阔的土地；（夏、商、周三代兴盛时，）国都鸡鸣狗叫的声音，边境上都听得到（指夏、商、周国都狭小、人烟稀少），而齐国却有那么众多的百姓。达：达到。 [23] 地不改辟矣：土地不需要再开辟。改：重新。辟：开辟。 [24] 以上四句意为，况且，一统天下的君王不出现，没有比现在隔得更久；百姓忍受暴政的折磨，没有比现在更厉害。憔悴：动词。困顿。 [25] 以上两句意为，德政的流行，比驿站传递还要迅速。置邮：驿站。

## [ 点评 ]

本章论王霸之辨，为孟子在齐国时与弟子公孙丑之间的对话。孟子尊王贱霸，故对管仲、晏婴的功业不屑一顾。那么，为何管、晏助其君主称霸天下，而文王行王道，历经三世才有所成？又如何对王、霸的现实功效做出解释和说明呢？这是宣扬王道者必须正视的问题。孟子认为虽然“王不待大”（3.3），称王天下未必一定就是大国，但推行王道还是需要一定的客观形势和条件的。管仲掌握当时强国齐国之政，又得齐桓公的信任，由于不行王道，故只是助桓公成就霸业，而没能称王天下。文王在力量悬殊的形势下，行王道而终于称王天下。这说明王道不仅具有正当性，在功效上也远胜于霸道。进而提出，当今之世，齐国如推行王道，必定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3.2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sup>[1]</sup>。如此，则动心否乎？”

“子曰：四十而不惑。”（《论语·为政》）四十不惑、四十不动心，其意一也。

以养勇说不动心。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

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sup>[2]</sup>。”

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sup>[3]</sup>。”

曰：“不动心有道乎<sup>[4]</sup>？”

曰：“有。北宫黜之养勇也<sup>[5]</sup>，不肤桡<sup>[6]</sup>，

不目逃<sup>[7]</sup>；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sup>[8]</sup>；不受于褐宽博<sup>[9]</sup>，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sup>[10]</sup>，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sup>[11]</sup>，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sup>[12]</sup>。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黜似子夏<sup>[13]</sup>。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sup>[14]</sup>。昔者曾子谓子襄曰<sup>[15]</sup>：‘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sup>[16]</sup>：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sup>[17]</sup>；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曾子之大勇，道义之勇，胜于北宫黜、孟施舍之小勇，血气之勇。

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

“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sup>[18]</sup>。’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sup>[19]</sup>。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sup>[20]</sup>。’”

评告子之不动心。

“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

无暴其气’者，何也？”

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sup>[21]</sup>。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sup>[22]</sup>。”

### [ 注释 ]

[1] 以上四句意为，如果先生担任了齐国的卿相，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即使成就了霸业和王业，也不足为怪。加：担任。赵岐注：“加，犹居也。”异：以为异，感到奇怪。 [2] 孟贲(b n)：古代勇士。 [3] 告子：赵岐说他姓告，名不害（《告子上》注）。《墨子·公孟篇》有他与墨子的问答，故亦有学者认为他是墨子的门徒。孟子在齐国时，曾与告子辩论（见《告子上》），当时告子的身份应为稷下先生。 [4] 此句意为，做到不动心有方法吗？道：方法。 [5] 北宫黜(y u)：古代勇士，姓北宫，名黜，生平不详。 [6] 肤桡(náo)：赵岐注：“人刺其肌肤，不为桡却。”桡：屈从。 [7] 以上三句意为，北宫黜培养勇气，肌肤被刺不退缩，眼睛被刺不逃避。不目逃：赵岐注：“刺其目，目不转睛逃避之矣。” [8] 以上两句意为，认为受一点点挫折，就像在大庭广众中被鞭打了一样。一豪：同“一毫”。一根毫毛。比喻极小或很少。挞(tà)：用鞭子或棍子抽打。 [9] 此句意为，不受普通百姓的羞辱。褐宽博：褐布做的宽大的衣服，为贱者之服。此指“衣褐之匹夫”（焦循《正义》），即下文的“褐夫”。褐：毛布。宽博：宽大之衣。 [10] 严：畏惧；害怕。 [11] 孟施舍：古代勇士，生平不详。下文他又自称“舍”，故或谓姓孟，名舍，施为发音词；或谓姓孟施，名舍；也有说姓孟，名施舍。 [12] 以上四句意为，把不能战胜的看作如同能够战胜一样。如果估量了敌人才前进，考虑了胜败才交战，这是畏惧强大的敌军啊。会：会和。指